

蒙古《大明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

陳學霖*

二十世紀初，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蒙古學者田清波神甫 (Antoine Mostaert, C.I.C.M.)，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獲得一件講述「大明永樂帝建造北京城的故事」的蒙文鈔本。鈔本有兩份，無撰人，寫作年代不詳，俱於一九〇七年騰錄。田神甫又收錄一則標題〈元太子、真太子〉，與前本內容相若但較簡略的口述故事並以法文翻譯。一九七二年，同教會的司律思神甫 (Henry Serruys, C.I.C.M.) 將鈔本作拉丁音寫及英文翻譯，題名 “Book of the Story of how Emperor Yung-lo of the Great Ming built the City of Peking. The Yüan Prince, The True Prince” (〈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元太子、真太子〉)，在是年由美國蒙古學會出版的《慶祝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教授七十壽辰論文集》發刊，學界由此知悉這件珍貴蒙古文獻。故事中的「元太子」指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成祖永樂帝，為明太祖第四子，生母為蒙古洪吉剌皇妃；「真太子」影射建文帝朱允炆，本是皇太子朱標次子，父死後立為皇太孫，二者因此是叔姪關係。故事編撰者在此故意調亂，改為同出明太祖及其蒙古皇妃的親兄弟關係。

本故事糅雜蒙古傳說及漢人歷史，敘事從元末漢人起義，蒙古末帝妥懽貼睦爾合汗出走大都，元朝滅亡起，至傳聞稱為其遺腹子的「元太子」登位，繼承養父太祖為明朝的永樂皇帝為止。內容包括漢人在閏八月十五中秋夕起義，大明朱洪武皇帝的軍隊攻陷大都，妥懽貼睦爾出走，遺下已懷孕的蒙古小皇妃隨即下嫁明朝皇帝，誕生了「元太子」和「真太子」，後來皇帝鑑於兩兄弟不斷爭鬥，將「元太子」出戍後來的北京鎮防，此時「元太子」記起先前母妃病危，曾給以兩道封密的信筒，囑他在危難時開視一封，在顯耀時開視另一封，於是啟視首封信件，照所指示請父皇派遣謀臣劉伯溫（基）隨行。到了戍地，遇到黑臉黑騎異人指授，便請劉伯溫依計建造都城，後來獲悉父皇病逝，幼弟「真太子」繼立，就領兵到南京拜祭，其弟懼怕報復，自縊身亡，「元太子」於是回北京登位為明朝的永樂皇帝。這些情節將歷史與傳說混淆，目的是宣傳永樂皇帝為妥懽貼睦爾合汗的遺腹子，因此元朝雖亡，統治中國明朝的仍是蒙古人的後裔，作為蒙古人喪失天下帝國的心靈慰藉。

*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司律思神甫的論文僅將蒙文鈔本音寫及翻譯，並未探索其史料來源以及故事的蒙漢歷史文化內涵。本論文將蒙文鈔本據英、法文本作漢譯，勾勒蒙漢史籍雜著及小說俗說，考覈各項事件情節的來歷，對故事的蒙古史觀及蒙漢文化交匯作深入分析，闡明此鈔本對蒙古史學研究的價值。

關鍵詞：元順帝 妥懽帖睦爾 合汗 永樂帝 明北京城 劉伯溫（基）

一、引言

一九〇六至一九二五年間，初到內蒙古伊克昭盟鄂爾多斯 (Ordos) 傳教，通曉蒙漢語文的比籍田清波神甫 (Rev. 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在草原牧地蒐集了一大批蒙文鈔本手稿，又記錄了眾多的民間口述故事，為研究蒙古語文歷史，及漠南蒙地的政治社會情況保存珍貴的資料。田神甫隸屬於比利時的天主教聖母聖心會 (Congrégation de l'Immaculé Coeur de Marie [C.I.C.M.])，這教會於一八六五年由比國布魯塞爾 (Brussels) 的天主教長老 Scheut 創立，一八七四年聖母聖心會獲得鄂爾多斯右翼前旗王爺許可進入傳教，在旗南邊的城川蘇木之 Boro-Balgasu 建立教堂，隨派遣有學養的教士到其地及鄰近地區傳教，足跡遍及民國建省時稱為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陝西、山西所轄各地。這些教士有四位成為出色的蒙古學專家，其漢文名為：田清波、¹ 許讓 (Louis Schram [1883-

¹ 關於田清波神甫的生平及學術，略見 Antoine Mostaert, "Antonio Mostaert, de studiis in linguam mongolicam per annos quadraginta optime merito," *Monumenta Serica* 10(1945): 1-4; Joseph van Hecken, "Antoine Mostaert, cism (1881-1971), apôtre des mongols et doyen des études mongoles,"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naire* (Immensee, Suisse) 28(1972), 1: 30-43; 2: 81-94; 3: 185-199; "Bibliographie Antoine Mostaert,"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Bonn), V(1972): 13-16. 詳見田神甫的紀念論文集：Antoine Mostaert, *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 C.I.C.M. Missionary and Scholar*, Vol. 1: Papers; Vol. 2: Reprints.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IV, V. (K. U. Leuven: F. Verbiest Foundation, China-Europe Institute, 1999).

1971])、司律思 (Henry Serruys [1911-1983])、賀歌南 (Joseph van Hecken [1905-1988])，他們俱已謝世。²

鄂爾多斯位於內蒙古西南部的高原，其名取自在元末居於該地的一個蒙古新部落，由太祖成吉思汗（1167-1227；1206-1227在位）兩個後裔的部落分離組合而成。清朝順治六年（1649）分鄂爾多斯部落為七旗一盟，稱伊克昭盟，民國十七年（1928）隸屬綏遠省，一九四九年後劃入內蒙古自治區。盟地西、北、東三面被黃河環繞，明以來漢人稱為「河套」，西接寧夏，東連山西，南靠陝西，以長城為界，南北略短而東西較長，面積為八萬七千餘平方公里。處於一個位在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由呼和浩特、包頭和東勝市構成的「金三角」地區。從元、明以來，鄂爾多斯部族不但在畜牧、漁獵、農耕收穫豐饒；在文藝創作方面，包括歷史著述、詩歌、民間故事亦有優異成績，使伊克昭盟成為近世紀內蒙古的重要盟地。³

一九二五年底，田神甫奉召回北京（三年後改稱北平），專注整理蒐集到的蒙古文獻和語言資料，展開新一頁的學術生涯。從這時到一九五〇年移居美國首都華盛頓近郊的 Arlington 鎮之前，他都居於北平，附屬於剛成立的天主教輔仁大學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iping)，并出任該校出版的東方學術刊物《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 的副編輯。這二十多年來他的著作包括多種蒙古方言詞典及蒙古語言的論文，一部拉丁音寫的蒙文本 *Textes oraux Ordos* (《鄂爾多斯地區口碑文學集》，1937；1947〔法文譯本〕)，⁴ 而以《鄂爾多斯蒙古語詞典》(*Dictionnaire Ordos*，三冊，1941-1944) 集其大成。移居美國之後，田神甫與哈佛大學的柯立夫教授 (Prof. Francis W. Cleaves) 緊密合作，影印出版他

² 關於許讓、司律思、賀歌南的生平及學術，略見 Joseph van Hecken, "Pater Lodewijk Jozef Maria Schram (1883-1971): Een Brugs missionaries en etnoloog," *Haec Olim* 21(1971): 16-24. Françoise Aubin, "In memoriam Le R. P. Henry Serruys (Ssu Lü-ssu 司律思), CICM (10 juillet 1911--16 août 1983)," *Monumenta Serica* 35(1984-1985): 555-624; "In memoriam Le R. P. Joseph van Hecken (Ho Ko-nam 賀歌南), CICM (18 Sept. 1905--31 août 1988): mongolisant, sinologue, missionlogue," *Monumenta Serica* 39(1990-1991): 325-350.

³ 以上參考伊克昭盟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伊克昭盟志》（北京：現代出版社，1995），第一冊，〈綜述·大事記〉及卷四〈民族·蒙古族〉有關部分。

⁴ Antoine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1937); *Folklore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1947). 前書有日文譯本，見磯野富士子，《オールドスロ碑集：モンゴルの民間伝承》（東京：平凡社，1966）。

所收藏的蒙文鈔本《蒙古黃金史綱》(Altan Tobchi)等書，共成《蒙古古文典》(Scripta Mongolica，三冊，1952-1959)，又根據他在鄂爾多斯蒐集的資料，陸續發表專著論文，但為數不多。到一九七一年息勞歸主後，他這批珍貴的蒙古文獻，便由司律思神甫保管，司神甫隨於一九七五年在《美國東方學報》發表〈源出鄂爾多斯的蒙文鈔本目錄〉，條列一百五十五件文獻，這些珍貴資料始公諸於世。⁵此後他十餘年來的重要著作，都是以考證和詮釋這些鄂爾多斯文獻為主。一九八三年司律思神甫謝世，他的所有珍藏由其胞弟，亦是教士兼古漢文字學專家的司律義神甫 (Rev. Paul L-M Serruys) 託管，準備在臺灣建立一家 Mostaert-Schram-Serruys Memorial Library，但是司律義亦於一九九九年歸主。嗣後 C.I.C.M. 教會將這紀念圖書館移返比利時，現在三者的全部手稿文獻都收藏於教會的 Scheut Memorial Library，位在比國魯汶 (Louvain) 近郊的 Kessel-Lo 鎮，為研究蒙古學的學者提供方便。⁶

筆者這篇討論明永樂皇帝建造北京城故事的蒙文文獻，便是田清波神甫從鄂爾多斯蒐集到一件內容最豐富的資料，鈔本有兩份，無撰人，寫作年代不詳，俱於一九〇七年謄錄。標題的拉丁音寫是 *Dayiming yuwa lowa gaghan begejing gata-(n)i bayighulughsan üliger-ün debter. yuwa(n) tayise. jing tayise*，英譯作 “Book of the Story of how Emperor Yung-lo of the Great Ming built the City of Peking. The Yüan Prince, The True Prince,” 本篇譯為〈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元太子、真太子〉，前為主題，後為副題。司律思神甫所撰目錄（見下）將此二鈔本編為63及64號，以下簡稱為甲、乙本。甲本面積114×260公釐，有封面封底，內文11頁，雙面，每面7行；乙本面積115×264公釐，行款同

⁵ Henry Serruys, “A Catalogue of Mongol Manuscripts from Ord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2(1975): 191-208. 其他從鄂爾多斯地區所得的蒙古文獻則見 Joseph van Hecken, “Documents Mongols (Ordos), provenant des Archives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de Boro Balyasu, Mongolie Intérieure,”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II(1969): 209-224; IV(1970): 327-342; V(1971): 105-119; VI(1972): 401-423.

⁶ Aubin, “In memoriam Le R. P. Henry Serruys,” *passim*. 司律義神甫的學行見 Paul L-M Serruys, “A List of Publications of Paul L-M Serruys up to 1977,” *Monumenta Serica* 33(1977-1978): II-V. 有關 Mostaert-Schram-Serruys Memorial Library 的情況，辱承友人澳洲國立大學蒙古史專家羅依果博士 (Dr. Igor de Rachewiltz) 告知，謹此申謝。Scheut Memorial Library 之地址為 Zavelstraat 78, B-3010 Kessel-Lo (Leuven), Belgium.

前。二本在語法上偶有差異，但內容並皆一致。⁷ 鈔本標題所稱「元太子」指燕王朱棣（1360-1424），即後來的永樂帝（太宗／成祖；1402-1424在位），為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在位）第四子，其生母為蒙古妃子；「真太子」影射建文帝朱允炆（1377-1402 [?]; 1398-1402在位），本是太祖嫡長子、皇太子朱標（1355-1392）正妃常氏所出之次子，父死後立為皇太孫，因此二者是叔姪關係。蒙古故事編撰者在此故意調亂，改為同出明太祖及其蒙古皇后（其實是皇妃）的親兄弟關係。此外，田神甫編輯的《鄂爾多斯地區口碑文學集》亦收錄一則標題〈元太子、真太子〉的口述故事，內容與文獻鈔本相若，但情節有若干改動增刪，可作比較研究。⁸

一九七二年，司律思神甫發表專文介紹〈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將蒙文鈔本作拉丁音寫及英文翻譯，以甲本為底稿，參以乙本，並在注釋說明其中差異，但未有探索其史事背景及史料來源。此文刊于是年由美國蒙古學會出版的《慶祝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教授七十壽辰論文集》，較司神甫所撰的〈源出鄂爾多斯的蒙文鈔本目錄〉早三年，自此學術界始知這件珍貴文獻的存在。不過，田神甫所編輯的《鄂爾多斯地區口碑文學集》早已流通，并有磯野富士子一九六六年日文譯本，而同年代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亦鄰真（林沉）教授曾將〈元太子〉故事漢譯，惜未有發表，其後同所周清澍教授撰文論〈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曾摘引其譯文，但亦未作深入分析。⁹ 筆者近年究心永樂帝的蒙古傳說及北京建城故事，曾多次採用這件蒙文文獻撰作專論，深感其史學價值及對探討蒙漢文化交匯的意義，因此將全文漢譯，並與口述故事比較同異，詳細分析其史事背景及史料來源以開拓前賢的研究。至於有關鈔

⁷ 這件文獻的著錄見 Serruys, "A Catalogue of Mongol Manuscripts from Ordos," p. 199, nos. 63, 64.

⁸ 本故事口述本收入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3-136; *Folklore Ordos*, pp. 189-195. 日譯見前揭磯野富士子譯本，頁32-41。

⁹ 見 Henry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 Hangin and U. 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8 (Bloomington, Indiana: Mongol Society, 1972), pp. 19-61. 又見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3：1-18。

本的種種蒙文語法及音寫等問題，由於司律思神甫已經作詳細考證分析，並不在本文的涵蓋範圍。¹⁰

二、譯文釋義

茲先交代這件蒙文鈔本描述故事的歷史背景。從標題所示，內文雖然包括一連串故事，而每一個都可能有不同的來源，但主要的史源有二：一是從蒙古人相傳明朝永樂皇帝燕王朱棣，為元朝末帝（明太祖諡為順帝）妥懽貼睦爾合汗〔合罕〕（*Toghon Temur gaghan*, 1320-1370；1333-1370在位）的遺腹子，其皇妃弘吉刺氏懷孕數月，於下嫁明太祖後誕生其子的傳說；二是在明太祖死後，朱棣以其姪建文帝信用姦臣，實行「削藩」迫害皇叔，破壞祖宗成法為藉口，自稱為太祖及高皇后嫡子起兵「靖難」，在攻陷南京，建文闔宮自焚後登基為皇帝之史事在民間的折射。前者源自十七世紀成書的《蒙古黃金史綱》（*Altan Tobchi*，又名 *Boghda chinggis qaghan-u chadigh*〔《聖成吉思汗傳》〕）、《蒙古黃金史》（*Altan Tobchi Nova*），以及《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chi*）等蒙文史籍；後者出於明初史官修纂關於燕王「靖難」的官書、《實錄》、政書，以及明嘉靖（1522-1566）後私人編纂之有關建文皇帝結局的稗乘雜誌，其間摻雜不少編造故事及野史傳聞。兩者湊合融會，便成為這奇異駭俗之蒙古傳說的源泉。¹¹

本文敘述的情節分八段。故事始於元順帝妥懽貼睦爾在位末年，朱洪武（元璋）率領漢人在閏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夕間起事，在各省召集大軍包圍元朝都城，妥懽貼睦爾逃亡，撇下懷孕的小皇妃。朱洪武入城後娶她為妻，數月後誕下一男

¹⁰ 見 Chan Hok-lam（陳學霖），“A Mongolian Legend of the Building of Peking”（1990）；rpt. in Chan,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variorum)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 Ltd., 1999), chap. V；又見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劉伯溫建北京城傳說探蹟〉（1993），重刊于同作者，《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頁65-86。

¹¹ 關於這些《蒙古黃金史》的內容，漢文介紹略見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3-8；詳見沙·比拉（蒙古）著，陳弘法譯，《蒙古史學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頁198-245。有關明初「靖難」之變的官書與建文皇帝的稗史傳聞，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及同作者，《明靖難史事考證稿》（四川李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所揭資料。

孩，她懼怕受害，竭力隱瞞嬰孩的身分，朱洪武以為是自己的骨肉，起名「元太子」，後來這個皇妃又誕下一男孩，命名「真太子」。蒙古生母怕他的兒子不知身世，於是在病危時把兩個留有遺言的「信筒」交給元太子，囑他在榮顯時開讀一個信筒，而在遇到苦難時開讀另一個信筒。故事又說朱洪武在這時候，作了個夢看見兩條蛇，一黑一黃，在他的跟前搏鬥。經過占卜者的解釋，他知道兩條蛇象徵他兩個兒子互相攻訐爭寵，於是派遣元太子到南口岔（在北京之北）鎮防，把真太子留在身邊。就在這時，元太子打開他生母遺下的一個信筒，內裏說當他出戍時，應該向父皇請求委派劉伯溫隨行，伯溫由是與北京城扯上關係。此後故事描述元太子和真太子一行到達南口後所發生的一連串奇蹟異聞。最突兀的是元太子一天在近郊行獵，突然被一位黑臉、黑衣、騎黑馬的異人攔著，要了他的弓和箭，向四方各射一矢。該人隨說箭落之地有無數金銀珍珠，著元太子把他手持的紅矛交給劉伯溫，用矛掘地便可得到珠寶，又請他委任伯溫為丞相，在其地建造一座大都城，跟著逸去無蹤。不久都城造成，劉伯溫就供奉元太子為「小皇帝」，然後稱這座城為北京。故事此後就敘述洪武皇帝病逝南京城，真太子登基，元太子隨即率兵入京城，披掛大孝向父皇的塋墳致祭。這時候真太子聽到他的長兄已經帶領士兵入城，懼怕起來便自縊身亡；元太子很傷心，跟著回去北京，在那裏登位做了「大皇帝」（合汗）并取得大明永樂皇帝的名號。最後，故事以元太子履行生母的遺言，打開另一個信筒，內裏講出他原是妥懽貼睦爾的骨肉，必需善待蒙古人為結局。在獲悉實情後，當上「大皇帝」的元太子於是廢除漢人斬下蒙古人的頭顱，以及把他們的心和肝臟割掉，在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夕間祭月亮的陋習，改用切開的西瓜和月餅為祭品。篇末加插永樂皇帝邀請烏思藏佛教宗喀巴大師來朝未果，隨邀得大弟子釋迦也失進京，弘揚佛法，超度眾生，而皇帝厚封他為「妙覺圓通慧慈……西天佛子大國師」等情節作為終卷。

以下將各情節參照蒙漢資料作一考釋：

（一）

我們偉大的祖先，聖福的耆老成吉思汗，以天縱無比的威力將許多部落和省份轄置於他的統治，建立了大元王朝，世世代代繼承，一共有十三位大汗在位。到了末期，在妥懽貼睦爾合汗的時代，每十個漢人的家庭都安插著一位蒙古喇嘛，把他們當作奴隸般統治。這些喇嘛蹂躪他們管轄下的男

童，而每當女孩要出嫁，他們把她帶走加以侵犯，說是要取她的初夜權。漢人對他們這些可恥和淫褻的傷痛壓迫都感到很憤怒，於是在妥懽貼睦爾在位的四十二年（原譯者注：這個年份是錯誤的，因為大汗即位至元亡僅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密議在同一時刻殺掉分頭管治他們的喇嘛，然後推翻蒙古的政權。他們雖然有了協議，但到那一天仍未準備好，於是決定改在同年閏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當月亮一升起，大家便去殺戮管治他們的喇嘛，把他們的頭顱和肝臟去祭月亮。¹²

本故事的口述本，根據田清波的法譯，與前文略有分歧：

在妥懽貼睦爾皇帝的時代，每十家漢人裏都讓一個喇嘛住著。那十戶人家娶新媳婦時，都要把她先送到喇嘛那裏過一夜，之後才歸回自己的丈夫，就這樣的暴虐漢人。在那個時代，漢人的男嬰出生後，右手的姆指都會被剝掉。為何要這樣做呢，其實是要使他們不能挽弓作戰。在那個時代，漢人向元的汗（皇帝）奉獻大量銀物，乞求免除孩子的指頭被剝掉。結果，在三個月間出生的嬰孩的手指都沒有被剝掉。在這三個月內誕生的嬰孩當中，出現了朱洪武（元璋）和李文忠等大量強悍的人物。朱洪武長大後，忍受不了蒙古人的壓迫，便靜悄悄和大家商量。決定一夜裏殺盡蒙古人，在六月初六夜間大家一起造反，殺掉身邊的喇嘛。後來，到了日子沒來得及起事，便再商定在八月十五日一夜把他們殺光，用他們的頭顱和心肝出去祭月亮，然後去圍住大同城（案：「大都」城之誤），殺死妥懽貼睦爾皇帝。¹³

這裏有幾點歧異。在複述每十戶漢人都被一位蒙古喇嘛管治之後，故事講出一條蒙古法律，規定漢人的男孩在出生後必須將右手的姆指剝去，使他們不能挽弓。同時，文獻本僅說在五月五日密議起事，沒有吐露原先商定的日期，後來才說改在閏八月十五日夜間採取行動。口述故事卻說議定在六月六日夜間造反，其後來不及於是改在八月十五日夜間舉事，此外還引進朱元璋作為起義的領袖，與文獻本說他在事後被民眾推舉為領袖有出入。綜合兩個版本，與史事記載比較，蒙古所傳故事有三點凸出歷史與傳說的相互交融。第一是說妥懽貼睦爾皇帝之時，每十家漢人裏都讓一個喇嘛住著，被其勞役而兒童們更受到虐待。第二是

¹²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0-41.

¹³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2-133; *Folklore Ordos*, pp. 189-190.

這些喇嘛不但蹂躪那些男童，每當女孩要出嫁，便以取初夜權為藉口，先把她帶走加以侵犯。第三是說漢人受不了殘虐暴政，暗中在妥懽貼睦爾在位的四十二年（應是三十五年）五月五日策動一起造反，殺掉身邊的喇嘛和推翻蒙古的統治，但到時（一說在六月六日夜間）仍未準備好，於是改在同年閏八月十五日（一說在八月十五日）夜間舉事。以下謹就史文略加爬梳說明。

關於第一點，說妥懽貼睦爾皇帝之時，每十家漢人裏都讓一個喇嘛住著，被其勞役而兒童更受到虐待，這裏顯然反映漢人在蒙古統治下所受到的一種殘暴待遇的集體追憶，事實是否如此史書未有道及。不過，元初遺民徐大焯在其雜著《燼餘錄》有類似的敘述：「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¹⁴ 又說：「鼎革後，城鄉遍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¹⁴ 據李模序言，徐大焯號城北遺民，元初居吳縣桃陽慶雲里，蒙古兵入蘇州時，他應是事變的目擊者。然而「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一說是否屬實卻有疑問，因為其說僅見於《燼餘錄》，他處記載沒有提到。時人楊訥研究元代農村制度，引用過許多史料，證明江南地區曾實行過社制。即使《燼餘錄》所述屬實，也恐怕只是北兵剛入吳縣時一度在當地施行的制度，其涵蓋範圍既不會越出吳縣一帶，實施時間亦不會太長。後來吳縣一帶實行的，照樣是里正、主首這套制度，把甲制當做元代江南的基層制度是錯誤的。¹⁵

關於第二點，說這些喇嘛不但蹂躪男童，而每當女孩要出嫁，便以獲取初夜權為藉口，先把她帶走加以侵犯。這個駭人的說法恐怕不是歷史事實，因為蒙元漢文官私載籍及明代史誌隨筆，都未有類此記載。不過，處女在出嫁前要請僧侶或法師破損處女膜，以私處流血象徵驅除童貞的邪惡，作為成年待婚的儀式，是中古時代中南亞地區，包括中國及南海島嶼的一些民族，在佛教及原始宗教影響下所流行對生殖器崇拜的風俗。一九二二年，日本學者岩井大慧發表〈元代の佛僧と成女式と〉一文，對這課題作了詳細研究。¹⁶ 記載顯示在宋元明時代，由於喇嘛教和婆羅門教僧侶的影響，西夏、西藏、古印度、真臘和暹羅諸國的一些民

¹⁴ 見徐大焯，《燼餘錄》乙編，收入謝家福輯，《望炊樓叢書》（蘇州文學山房據光緒中原刊本彙印，1924），頁26a, 29a。

¹⁵ 見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4：118-120。

¹⁶ 見岩井大慧，〈元代の佛僧と成女式と〉（1922），收入同作者，《日支佛教史論攷》（東京：東洋文庫，1957），頁357-544。

族都流行這種成女禮儀。例如宋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韃事略》載：「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室女》云：「富家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關於僧道成女式則擇夜間而行：「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身，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于額上。」又言：「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明馬歡（?-1451）《瀛涯勝覽·暹羅國》記：「男女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就是僧討取童女喜紅，貼於男之面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¹⁷可見請僧侶討取童女喜紅，轉貼於男之面額，已演變為成親的儀式，而「利市」的典故由此而起。此處言僧侶去其童身，即是以指挑損處女膜，膜損流血在宗教上有去邪的意義，故此種由僧道祭司主持的成女式極為神聖，並非指以口破瓜或甚至與處女交媾之事。雖然僧道祭司藉此風俗與童女交媾並非絕無，但會被視為軌外的行為，為教規戒律所不容。這種盛行亞洲的習俗與中古歐洲的「初夜權」（*ius primae noctis*）觀念類似，但是歐洲的僧侶主要以交媾為成女儀式，造成不少淫慾犯姦的穢行。蒙古和元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除外）並未流行成女的風俗，權衡《庚申外史》卻有妥懽貼睦爾皇帝時，宣政使哈麻陰薦西天僧以運氣媚帝，取良家女供奉為樂，殃及禁中君臣的記載。《元史·哈麻傳》引述其言並作補充云：「帝乃詔以……西番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¹⁸蒙古故事說喇嘛不但蹂躪男童，而每當女孩要出嫁，便以獲取初夜權為名加以侵犯，顯然附會這些歷史上的民間風俗，醜化西藏喇嘛僧的穢跡惡行。

至於第三點，故事說漢人在五月五日暗中策動一起造反，殺掉身邊的喇嘛和推翻蒙古的統治，但到時（一說在六月六日夜間）仍未準備好，於是改在閏八月

¹⁷ 見彭大雅著，徐霆疏，王國維箋注，《黑韃事略箋注》（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頁108；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20；周達觀著，夏鼎校注，《真臘風土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06-107。按頁108注「陣毯」謂其詞乃馬來語譯音，源出梵文 *cinta*，華人稱之為「利市」云。

¹⁸ 權衡，《庚申外史》，見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70-71；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二〇五，頁4583。

十五日（一說在八月十五日）夜間舉事。這裏說漢人在五月五日策動造反，這個日子是紀念屈原的端午節，起義者大概借此大家聚集慶祝節日的機會，密議一同採取行動殲滅甲主。傳統的說法都說在閏八月或八月十五日起義，因為故事是以在月餅餡內藏字條約在中秋夕行動為中心，八月十五就是中秋節。不過，除卻藉中秋節吃月餅為起事提供上好的機會外，在是日起義反抗政權，又有其他的歷史先例。自明中葉以來，閏八月十五日被一些民間宗教信仰者認為是三元劫運之日，是變天的日子，故明清時期這一日發生的動亂特多。例如嘉慶（1796-1820）初的華北民間祕密組織八卦教（舊稱天理教，前身為白陽教），其〈天書〉內就有「八月十五，中秋八月，黃花滿地開放」的識語，句中第二個中秋，就是閏八月中秋，相當於新頒時憲書的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1813.10.08）。（案：嘉慶十六年〔1811〕八月，清廷迷信天象，認為本朝不宜閏八月，於是將閏八月自嘉慶十八年的九月改為十九年〔1814〕的二月，民謠因此而起。）是日八卦教首領順天府大興縣人林清（1770-1813），便率眾在北京起事，闖進紫禁城，計劃趁嘉慶帝回鑾時刺駕，但因各路未能配合而失敗，教首及信眾多被誅戮，時稱「癸酉之變」。雖然如此，閏八月十五日在民間產生很大的迴響，認為是紅陽末劫、彌勒降生應驗的日子，因此人們迷信是日都會遇到變亂，清末流傳的元末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便很可能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¹⁹

（二）

跟著，漢人推舉一位富有膂力和才幹、名叫朱洪武的漢子當他們的領袖，在各省召集大軍。當他們去攻打妥懽貼睦爾合汗，無論如何抵抗，他的軍隊都不足禦敵，於是漢人的軍隊包圍了大同城（原譯者注：應是「大都」之誤）。在那時候，妥懽貼睦爾合汗和他的大臣圖不圖·墨爾根（？）（Tulbutu-mergen）商量出走的辦法，他就是丞相多羅汗（？）（Dologhan）

¹⁹ 關於八卦教首領林清京師叛亂事件，略見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四篇；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第二、四、六章；又參見莊吉發，〈閏八月——民間祕密宗教的末劫預言〉，《歷史月刊》92(1995)：61-65；及鄭志明，〈末劫預言與卯劫觀音〉，《歷史月刊》92(1995)：65-69。元末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傳說故事的研究見 Chan Hok-lam, "The Demise of Yuan Rule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Legends" (1992); rpt. in Chan, *China and the Mongols*, chap. X.

的兒子。這位大臣說：「家父曾說過，當所有的辦法都失敗，在〔宮殿或都城？〕後的岩石下面，有一條直通蒙古平原的地道〔，可以從該處出走〕。」合汗因此攜同他的玉璽和挽著他的「大皇后」一起走，同著墨爾根大臣三人找到了地道，合汗還把玉璽放在岩石上，留下了印跡。（案：「大皇后」一詞蒙文為 *bagh-a ghatun*〔即 *qatun*〕，英文原譯作 *great empress*，今從其意漢譯。但下文凡提到 *qatun* 則改譯為「皇妃」以吻合故事的內容，避免混淆。）

從那裏他們走至 Kinar (Keyira；金蓮川？) 的平原，找到三匹馬，他們便馳騁杳無蹤影。當朱洪武和他的兵士進入城後，找不到合汗，只找到地道和璽印；他知道合汗已逃遁，於是帶同軍隊去追捕。妥懽貼睦爾等三人一起上路，當他們抵達 Tuul 河（原譯者注：即 Tuula〔土刺〕河），河已被洪水淹沒，無法過渡，幸而上天發下一道彩虹使他們平安渡過。當漢人的軍隊趕上，橋已消失，不能渡河，只好回師。妥懽貼睦爾合汗於是在克魯倫 (Kerülen) 河畔建造一座稱為巴爾斯·和坦 (Bars Qota) 的城（原譯者注：意即「虎城」），就留在那裏統治蒙古各族。²⁰

上面傳述朱洪武召集大軍，進攻妥懽貼睦爾的都城，及其出亡漠北等事都與史實不符，諒係採自蒙古野聞。首先，故事說漢軍包圍大同城，其實是大都城之訛。根據司律思神甫的注釋，大同城蒙文音寫是 *Dayitung*，而大都是 *Dayidu*，說話人訛讀字音，又昧於歷史，因此把大都混淆為大同，後出的蒙古傳說都承襲其錯誤。故事又說在這時候，妥懽貼睦爾和他的大臣圖不圖·墨爾根商量出走的策略，他就是丞相多羅汗的兒子。前者《元史》不見記載，後者未悉是否《元史·順帝紀》二處提到的陝西行省左丞相禿魯。但他在至正二十八年，即洪武元年 (1368) 八月，明軍攻城時受命率軍東出潼關，攻取河洛，並不在大都。²¹ 蒙古傳說來歷不明。值得注意的，上面提到這位大臣說：「在〔宮殿或都城？〕後的岩石下面，有一條直通蒙古平原的地道〔，可以從該處出走〕。」口述本則說妥懽貼睦爾在都城中挖了個洞，挽著他的大皇后并攜同玉璽逃走，後此都有類似的蒙古傳說。已故美國蒙古史家拉鐵摩爾教授，曾報導近世漠北講故事者傳述另一則關於建造北京城的故事，亦說妥懽貼睦爾的都城名為大同，因此當他挖了個洞

²⁰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 41.

²¹ 禿魯事跡見《元史》卷四七，〈順帝紀十〉，頁979, 980, 983, 985。

逃走，論者便指這可能是影射雲崗的石窟，因為雲崗地近大同，真是以訛傳訛。²²

《元史》和《明史》記載大都的陷落和元順帝的出亡與蒙古傳說截然不同。大都於洪武元年八月庚午（1368.09.14）淪陷，領軍攻城的不是當了大明皇帝的朱元璋，而是他的左右手大將軍徐達（1332-1385）。城破四天前妥懽貼睦爾率后妃、皇太子及百官出奔上都開平，一年後逃往應昌府，仍稱大元皇帝（國史稱北元），於洪武三年四月丙戌（1370.05.23）以痢疾病逝。太子愛猶識理達臘（Ayuširidara, 1338-1378）嗣位，然未幾徐達、李文忠（1339-1384）等率明軍攻破應昌，隨領敗兵走和林（今蒙古共和國哈爾和林〔Qaraqorum〕），洪武十一年（1378）四月死於其地。²³ 妥懽貼睦爾倉皇逃難的情況，當時任監察御史並曾扈從的張佑有記載，今傳劉（？）佑的《北巡私記》就是其書。略云：

至正元二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皇帝（太子賜諡號）御清甯殿召見群臣，諭以巡幸上都，皆屏息無一言。……是夜漏三下，車駕出建德門，率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從者，左丞相失列門，平章政事臧家奴……等百餘人。……二十九日，車駕至居庸關，……三十日雨，駕次雞鳴山。……八月初一日，雨，……是夜駐驛營口。……初二日，雨不止，百官兩行，皆露透。……初五日，也速奏京師失守。……初七日，左丞相失列門卒。……初九日，車駕至中都。……十五日，車駕至上都。上都經紅賊焚掠，公私埽地，宮殿官署皆焚毀，民居間有存者。……九月初六日，……有勸上北幸和林者，上遲疑不決。……（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日……，賊首為常遇春，……率步騎十萬入寇，（左丞相）也速（不化）公戰不利。……初七日，敗，書聞，上急召群臣，議幸和林。……十三日，車駕幸應昌府。……十七日，賊陷上都。……二十日，車駕至應昌。二十一日，帝不豫，二十六日，帝疾瘳，始議幸和林之計。……十一月十八日，……（梁王）擴廓（帖木兒）附

²² 這口述傳說收入 Owen Lattimore, "A Mongol Legend of the Founding of Peking,"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III(1979): 237-239. Lattimore 評論見 p. 237.

²³ 見姚廣孝等監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卷三四，頁0600；卷五二，頁1021；卷一一九，頁1927。《元史》卷四七，頁986。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頁20，24。參閱吳晗，《朱元璋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133-135。邱樹森，《妥懽貼睦爾傳》（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八章。又見葉新民，《惠宗北走與上都的變遷》，《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頁206-232。

奏，請車駕速幸和林，勿以應昌為可恃之地。……三十年正月初二日，帝不豫，詔皇太子總軍國諸事。初九日，詔觀音奴公，賁手詔，賜擴廓帖木兒王徵其入衛。觀音公奏請以張佖從行，上允之。²⁴

可見妥懽貼睦爾至死前仍認為應昌可守。

這些經歷蒙古史冊都沒有記載。羅（卜）桑丹津 (bLo-bzan bsTan-'jin) 的《蒙古黃金史》則說合汗曾作一個異夢，夢見許多敵兵圍城：「因為怕那些敵〔兵〕，就在城裏繞著跑，幾乎連看一看的時間都找不到。趕緊往西北跑，〔在那裏〕看見一個洞，恨不得把可汗的〔大〕位，全國的百姓都撇下，從洞裏鑽出去纔好。因此就叫漢地的賢者解釋說：『我這個夢是好還是壞呢？』那個賢者解可汗的夢說：『好像可汗將要失掉汗位。』那以後，蒙古的托托 (Toghto) 丞相遠征得利，打了勝仗。〔有一天〕可汗按夢的預兆，到西北一看，果然有一個洞。〔心想〕：『我這個夢竟是真的。』就害起怕來。」²⁵ 藉著夢兆預告汗位的淪亡。

故事口述本則說妥懽貼睦爾挽著他的大皇后并攜同玉璽，在都城中挖了個洞，逃了出來之後，朱元璋便進入他的宮殿，得悉皇帝已經逃掉，跟著便介紹皇帝的小皇妃，說她對朱元璋恭謹行禮，表現得和藹可親，朱元璋被其美色吸引，於是娶她為妻子。朱元璋聽到元皇帝逃藏在洞穴後，一直加以追捕，結果追至某海畔。到追上之際，一隻金舟從天上降下，妥懽貼睦爾於是乘金舟離去，隨即往海的對面，在 Bars Qota 建都稱帝即位。這個說法的紀事次序和內容與文獻本有出入，而所言天上降下金舟，使他們一行乘舟而離去的故事似另有出處，容待細考。²⁶

關於妥懽貼睦爾等眾，被明軍一路追擊到土刺河不能過渡，幸而天上現出一道彩虹使他們平安渡過，而當漢人的軍隊趕上時橋已經消失，無法追趕的異聞不見其他蒙古史傳，但是萬曆 (1573-1620) 面世的明人講史《英烈傳》則有類似的

²⁴ 劉（？）佖《北巡私記》由羅振玉刻入《雲窗叢刻》（民國三年〔1914〕），共五葉，篇終署咸豐己未（九年〔1859〕）獨山莫友芝手鈔。據附錄柯邵忞識語，元順帝北奔後舊史無徵，賴有此書略見當日之梗概，惟輾轉遂寫，不免奪舛，惜無別本校勘。如此書載紀事者為監察御史張佖，但今本書作者為劉佖，未悉是否傳鈔誤筆，抑或張佖入明後易姓，是一史學懸案。

²⁵ 《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78。參見色道爾吉譯，《蒙古黃金史》（呼和浩特：蒙古學出版社，1993），頁302。

²⁶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3-134; *Folklore Ordos*, pp. 190-191.

記載。此書第七十三至七十四回說明軍攻陷大都，元主出走應昌後，李文忠率兵追過遼寧錦州的紅羅山，將及五十里，元兵乏食，驚荒逃避。傅友德 (?-1394)、朱亮祖 (?-1380) 奮擊，斬獲二十餘級，止三五百騎隨元太子前至烏龍江，渺渺茫茫，無船可渡。「那太子血淚包著雙珠，下馬跪在地上，望著青天禱告：『我世祖奄有中國已經百年，今大明追逐我至此，無路可逃，全望蒼天不殄滅我等，曲賜全周！』」……忽然江上雪浪分開，狂波四裂，顯出一道長虹，橫截那千頃碧水上一條銅橋，待元兵一湧而渡。朱兵連忙追及，將欲上橋，誰想是空中一條白浪，何由得濟。文忠看了，歎息數聲，說道：『可知皇天不欲絕彼。』」²⁷ 這則敘述與史書記載有出入。關於蒙古軍駐屯紅羅山，前揭劉（？）佶《北巡私記》記載：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車駕至上都。……（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太子出屯紅羅山。……（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車駕幸應昌府。……十七日，賊陷上都。……二十日，車駕至應昌。……二十六日，帝疾瘳，始議幸和林之計。……（九月）二十五日，也速丞相退保紅羅山。……²⁸

其時間與人事截然不同。《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年五月辛丑 (1370.06.07) 又載：左副將軍李文忠趨應昌，癸卯 (1370.06.09)，追至應昌，遂圍其城。明日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喇 (Maidiribala) 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惟太子愛猶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至……紅羅山，又降其將楊思祖等一萬六千餘人，師還北平。（案：《明史·李文忠傳》紀事本此）²⁹

據此可知李文忠根本未與太子交鋒，《英烈傳》記述天降長虹橫截江上成一條銅

²⁷ 見徐渭（？）著，趙景深、杜浩銘校訂，《英烈傳》（上海：四聯書店，1955），頁409-417，引文見頁416。《英烈傳》為一演明初開國功臣事跡的通俗小說，據說是國初名將郭英 (1335-1403) 後人郭勛 (1475-1524) 為宣揚其祖所作。是書有三種祖本，《皇明開運英武傳》八卷本，萬曆十九年 (1591) 刊；《新刻皇明輯略武功名世開運英烈傳》六卷本，亦萬曆年刊；《皇明英烈傳》六卷本，崇禎元年 (1628) 序刊。今傳《英烈傳》別名《雲合奇蹤》，一題徐渭 (1521-1593) 所編，有甲乙二本行世，其一有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序，現行的趙景深、杜浩銘本係據前二本校訂。詳見前揭《英烈傳》序言；又見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3），頁176-209。英文論述見 Chan Hok-lam, "Liu Chi (1311-75):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1967); rpt. in Chan, *China and the Mongols*, chap. VIII.

²⁸ 《北巡私記》，頁2上-5上。

²⁹ 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九，頁1935；《明史》卷一二六，頁3744。

橋，使元兵安渡的奇蹟顯然是說書者杜撰。今本〈元太子〉的情節與漢人講史大同小異，而《英烈傳》在明清甚流行，成為京師說書演劇的話本，蒙古通漢文的自然容易受到影響，作為編述傳說故事的資料。

這個《英烈傳》的紅羅山故事還有餘聞。下文接著說李文忠歎息數聲之後，突然聽到響亮一聲，看見紅羅山上有個東西，身高六尺，色若烏雲，頭上一角，碧色的一雙眼睛，如笙如簧地叫響。文忠對下屬說：「此必是角端神獸了。」因高叫說：「角端，角端，爾乃天之神奇，物之靈異，必能識天地未來氣數，倘元人此後更不復生，爾可藏形不叫；若是元人復生，爾可叫一聲；若止南侵，不能進關，爾可叫兩聲；若復來犯邊，爾可叫三聲。」文忠吩咐方罷，那獸連叫三聲而去。這裏的史源來自元中書令耶律楚材（1189-1243）的〈神道碑〉，後轉載於《元史·本傳》，據說他在一二一九年隨成吉思汗西征花喇子模（Khwarezm），駐紮鐵門關時，遇到天遣神獸「角端」警戒妄殺，因勸喻大汗不如退兵，結果從其請而回師。鐵門關即今日烏茲別克共和國（Uzbekistan）之 Buzgala Pass，「角端」究竟為何物，今人議論紛紛，澳洲國立大學蒙古史專家羅依果博士（Dr. Igor de Rachewiltz）懷疑是犀牛，耶律楚材藉此諷諫迷信神異的蒙古大汗使之休戰。無論如何，這個故事深入蒙古人心，風行一時，〈元太子〉雖然並無提到「角端」，但是故事膾炙人口，對於有關的蒙古傳說流傳，無疑會有很大幫助。³⁰

至於妥懽貼睦爾建造巴爾斯·和坦「虎城」，《蒙古黃金史》在敘述合汗倉皇出走大都後說：「〔合汗〕出兔兒口（一作古北口），建立虎兒城」，稍後薩囊徹辰（Sagang-sechen, 1604-?）的《蒙古源流》亦言順帝在大都失守後，「遂聚前後脫出之六萬人，至克魯倫河邊，築巴爾斯城而居」。其他蒙古記載亦有類似的說法。³¹ 這座「虎城」據說在遼代已有，到清代尚存。張穆（1805-1849）

³⁰ 《英烈傳》，頁416。耶律楚材「角端」故事見《元史》卷一四六本傳，頁3456；史源為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收入蘇天爵，《國朝〔元〕文類》（《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五七，頁9b-11a。有關「角端」故事的研究，見 Igor de Rachewiltz, "Yeh-lu Ch'u-ts'ai (1189-1243): Buddhist Idealist and Confucian Statesman,"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94-195; "More about the Story of Činggis-qan and the Peace-Loving Rhinoceros," in A. R. Davis and A. D. Stefanowska (eds.), *Austria: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n Oriental Society, 1982), pp. 13-26. 其他論著見後者所引。

³¹ 見《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79；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

《蒙古游牧記》引龔之綸《後出塞錄》有詳細介紹：「達賴貝子所屬境內，有城名巴喇河屯，譯言『虎城』也。城內廢寺甚大。後殿有二塔，一七層，一五層，二塔壁間所續諸佛像俱在。其七層者，內有石臺，上供木匣，長三尺許，貯畫一軸，上續三世佛及文殊、普賢并四大天王像。殿則有碑記，字多剝落，間有一二字可識，彷彿遼時之物。」（案：達賴，即車臣汗部固山貝子達哩〔又作達禮〕，其牧地在克魯倫河之南博羅布達。）此處描述甚詳，但城係在河下游之北岸，不是在其南，又並未提到元朝末帝建城。³² 其實，妥懽貼睦爾建造「虎城」之說恐係出於附會，因為根據記載，順帝從大都出走至開平，然後遷往應昌，並無建城的紀錄，況且「虎城」是位於漠北的克魯倫河畔。根據日本和田清博士的觀察，此種傳說之所以發生，可能是明初這一地區曾是蒙古可汗一個衙庭所在地。³³

（三）

朱洪武進入妥懽貼睦爾合汗的皇宮，那裏有一位被合汗遺棄的「小皇后」（案：此詞蒙文為 *qatun* 哈屯，可譯作「皇后」或「妃子」，但以下劃一改譯為「皇妃」避免混淆），年輕美貌而又明慧，她立即往見洪武皇帝，拱拜叩頭行禮表示恭順，一聽到她的悅美平和言辭，朱洪武的心神就被懾著。當他表示想娶她為妻的時候，所有大臣都警告不要和敵人的朋友結緣，但他並不聽從，於是封她為「皇后」（案：英文原譯為 *empress*，但是朱洪武其實冊之為妃）。跟著，由於懷疑和懼怕蒙古人，他在大同城（案：大都城之訛）委任一位大臣，命令他去管治，而自己就離開其地，到南京建立都城。

後來，那位曾跟妥懽貼睦爾合汗同起居的小皇妃已經有孕。她心裏想：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頁42；《蒙古黃金史》，頁303。又見道潤梯步，《〔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卷五，頁223；及此書原文漢譯本：沈曾植箋注，張爾田校補，《蒙古源流箋注》（沈氏《海日樓遺書》第一種，姚家埭沈氏藏板，1932），卷五，頁3a。關於此書之源流，見下注39。

³² 張穆著，何秋濤校，《蒙古游牧記》（收入浦□編輯，《皇朝藩屬輿地叢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刊本），卷九，頁8b。

³³ 見《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79，注8引。和田清說原載《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頁182, 252。

「如果我很快就生產，他們一定會把〔孩子〕殺死。」因此，她向「三寶」³⁴ 祇虔誠地靜默祈禱，結果在與朱洪武成婚十二個月後誕下一個兒子。當皇帝找到一位占卜者去審視這孩子時，那人說：「這孩子的命運非常吉利，他會繼承他的父親去統治政府和保護人民。」因此，他便給孩子起名「元太子」。但當那些大臣對皇帝說：「從卜者為孩子取名為元太子來看，那是蒙古的太子之意，由於他肯定是蒙古合汗的兒子，你不應該養育他。」皇帝勃然大怒，他威嚇地說：「〔根據慣例〕人寄在母胎九個月後即誕生，而這孩子在我與哈屯在一起十二個月後始出生，怎會是蒙古合汗的後裔呢？」在這個問題上，所有大臣都無法作答。

當另一個兒子出生時，〔皇帝〕又請占卜者去審視，他說：「這孩子的運程沒有像他哥哥好。」於是命名「真太子」，意思是漢人的太子。³⁵

這故事口述本簡略地說：

朱洪武進入皇宮後，知悉皇帝已經逃掉，小皇妃對他恭謹行禮，表現得非常和藹可親，朱洪武被其美色吸引，就決定娶她為妻子。……朱洪武并不知道，他娶的妥懽貼睦爾合汗的小皇妃已懷孕兩個月，到十二個月後，小皇妃生下一個兒子。朱洪武找著一位占卜者為他算命。他說：「這個孩子的命運很不尋常！」因此朱洪武給他起名「元太子」。過了兩年，那個皇妃又生下一個兒子。朱洪武又找那卜者為他算命。他說：「這孩子的命運比不上他的哥哥」，於是起名「真太子」。³⁶

這裏略去朱洪武懷疑小皇妃懷孕的情節，但清楚地說出她後來再生一個兒子，起名「真太子」。「元太子」和「真太子」顯然是指成祖和建文帝，但是編造故事

³⁴ 「三寶」，Serruys 英譯作 “Three Jewels”，蒙文音寫為 *ghurban erdeni*，即梵文之 Triratna (Three Precious Ones)：Buddha (佛)、Dharma (法) 及 Senga (僧侶)，為釋教信徒供奉的主要對象。釋義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第189號，卷三，頁645a；及《增一阿含經》，前刊書第125號，卷四八，頁806b。對「三寶」的歌頌常見於十七世紀所編纂的蒙古宗教和史學典籍，例如佛典 *Čigula kereglegči tegüs udqa-tu šastir*（《本義必用經》）及阿勒坦汗 (Altan Qan, 1507-1583) 的傳記 *Čakravartin Altan Qaghan-tu tugui*。後者有珠榮嘎校訂本，題名《阿勒坦汗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參見 Walter Heissig, “Ein Quellenbezug der Altan Khan Biographie,” 《蒙古史研究》1(1985)：185-192。

³⁵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1-43.

³⁶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3-134; *Folklore Ordos*, pp. 190-191.

者故意將二人的叔姪關係混淆為兄弟關係。不過情節比較簡化，沒有提到小皇妃向「三寶」虔誠祈禱，懷孕十二個月後始生「元太子」。與前者最大的差異，是更清楚地說出皇妃為洪武皇帝再生一個兒子，命名「真太子」，加強故事的戲劇性。

類似的故事，屢見於十七至十八世紀間蒙古史家編纂的各種《黃金史》。例如一六〇四至一六二七年間成書的《蒙古黃金史綱》便有如下的記載：

當彼之帝位被奪之際，〔妥懽貼睦爾・〕烏哈噶圖 (Ukhaghatu) 汗的弘吉拉哈屯已懷孕三月，那哈屯以匿於甕中而落下了，漢人呼甕為「缸」，蒙古則名之為 *butung* (案：譯者注音作「博通」)。彼哈屯為漢人朱洪武皇帝所收納。哈屯心想：「如分娩於七月之後，必以敵人之子而被加害；若分娩在十月之後，當視作己子而免於難，願天父憐憫，再添三個月，湊足十個月吧！」如此祈禱度日，上蒼垂恩，於十三個月上生下一子。洪武皇后也誕育了一個兒子。³⁷

羅(卜)桑丹津的《蒙古黃金史》(約於一六四九至一七三六年間寫成)，在記敘妥懽貼睦爾合汗的事跡，亦加插以下的故事：

當社稷淪亡的時候，烏哈噶圖可汗的翁吉剌惕夫人正懷著三個月的孕。那位夫人就藏在〔一個〕甕裏。那個甕漢語叫做「缸」，蒙古語叫做 *botong*。漢族的朱洪武可汗娶了那個夫人，〔留她〕住在宮裏。那個漢人想，如過了七個月就生產的話，〔必〕是敵人的兒子，就〔把他〕殺掉；若是過了十個月〔纔〕生產，就是自己的兒子，不可胡作非為。夫人就〔暗中〕祈禱說：「我們的天父啊！請你垂恩，給加添三個月，叫過十個月〔再生下來〕吧！」上天垂恩，果然過了十三個月，纔生下一個男孩兒，朱洪武可汗的漢族夫人〔也〕生了一個孩兒。³⁸

最後，薩囊徹辰的《蒙古源流》(康熙元年〔1662〕成書)再補充說：

先是，蒙古之托歡帖木爾・烏哈噶圖合罕時，歲次戊申 (1368)，漢人朱葛諾延 (譯者案：漢語「朱哥」，即朱元璋)，年二十五歲，襲取大都城，

³⁷ 見《漢譯蒙古黃金史綱》，頁46-48。

³⁸ 羅(卜)桑丹津的《蒙古黃金史》漢譯有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及色道爾吉譯，《蒙古黃金史》。前者譯文見頁186；後者譯文見頁308-309。此處採用前者。此故事又見《漢譯蒙古黃金史綱》，頁46。早年學者對這個蒙古傳說的討論見山本守，〈永樂帝と建文帝——永樂帝と蒙古伝記〉，收入《遼東の珠》(盛京：滿洲時代社，1944)，頁107-117。

即合罕位，稱大明朱洪武合罕焉。當時，烏哈噶圖合罕之第三妃子——乃洪吉刺特之托克托太師之女——格呼勒台夫人，適懷孕七月，因步重而不行，洪武合罕納之。越三月，即是戊申年，誕一男矣。……朱洪武降旨，……遂為己子矣，與漢夫人所生之子朱「達噶雅」（原注云：「清譯為『朱代』，……即『朱棣』譯音，蓋誤。」案：此應指建文帝朱允炆）共二子。乃父朱洪武合罕在位三十年，歲次戊寅（1398），年五十五歲崩。其後，大小漢官共議之曰：「蒙古夫人之子雖居長，係他人之子也，若其長成，難免與漢國為仇。漢夫人之子雖為弟，乃嫡子也，當奉為合罕。」³⁹

這些傳言顯然是〈元太子〉故事的史源，稍差異的是《蒙古黃金史》和《蒙古源流》一致說那位蒙古哈屯只生一個元太子，而洪武皇帝的另一個太子則是漢人皇后所生。不過，永樂帝為元順帝遺腹子之說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朱棣生於至正二十年（1360），較諸故事說朱元璋在元都淪陷（1368）後，入皇宮遇到被遺棄、已懷孕的蒙古小皇妃，被她的美艷吸引而娶為妻子，在時間上早了八、九年。然則燕王朱棣的生母是誰？永樂官書說她是洪武皇帝的正室皇后馬氏（1332-1382），明中葉後出的私家記載則說她是蒙古「碩妃」。碩妃之名，不是出於傳說稱元順帝的小皇妃在都城淪陷時匿於甕中，而漢人呼甕為「缸」，是她的部族名弘（洪、翁）吉刺：Qonggirad 或 Khungirat 對音漢譯的首字。官私記載如此牴牾，引起後人爭論，其中關鍵，對〈元太子〉故事的發展甚為重要。

成祖生母為高皇后之說，本於永樂初史官編撰的《奉天靖難記》和《天潢玉牒》；前者為燕王「靖難」的官方紀錄，後者是為重修《太祖實錄》編纂的洪武朝編年記載。《奉天靖難記》卷首言：「今上皇帝，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棧〔1356-1395〕）、次晉王（橐〔1358-1398〕）、次今上皇帝，次周王（橐〔1361-1425〕）也。」《天潢玉牒》一本說高皇后生五子，另本言止生燕王與周王二子，官方紀錄以五子說為正本。⁴⁰ 據〈燕王令旨〉檄文，朱棣於建文元年（1399）七月起兵發難，即屢屢自

³⁹ 見《〔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卷八，頁464。此書簡介見沙·比拉著，陳弘法譯，《蒙古史學史》，頁222-245；詳細研究見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此蒙文本《蒙古源流》有欽定滿、漢兩種譯本，分別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及五十四年（1789）奉敕譯進，見原書兩種譯本序言。漢譯出自滿文譯本，今有《蒙古源流箋注》，本注引文見1932刊本，卷八，頁17b。

⁴⁰ 見《奉天靖難記注》卷一，頁1，36；《天潢玉牒》高皇后生「五子」說有兩種版本，見

稱「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以提高其身分作為「靖難」的號召，而在功成登基後，更發動史官宣傳其地位以維護其繼統的合法性。王崇武指出朱棣冒稱嫡子，蓋因太祖對繼統法規甚嚴，《皇明祖訓·法律》第十四條明言：「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朱棣係援用「兄終弟及」原則，據此，若己為高皇后所生，而其時二兄秦王及晉王已卒，則在建文帝自焚後成為依法繼承太祖的唯一王子。⁴¹ 由於朱棣的出身並非如此，而記載又不少與其「靖難」藉口牴牾，因此需要竄改紀錄，掩飾篡奪並為繼統正名，這便是永樂帝編纂宣傳官書，及兩次改修《太祖實錄》的主要原因。成祖的子孫為保持皇權的合法性，必須鞏固其先祖的地位，因此《太宗實錄》及後來的明代官史政書，以及清朝官修《明史》皆維持成祖生母為高皇后說。⁴²

到明朝末年，成祖為高皇后嫡子之說，由於天啓三年（1623）沈若霖編的《南京太常寺志》記載孝陵饗殿之太祖后妃神位，揭露成祖生母碩妃獨向西列開始動搖。史家著述如何喬遠（1558-1632）《名山藏·典謨記》、談遷（1594-1658）

沈節甫編輯，《紀錄彙編》（長沙：商務印書館影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本，1938），卷一二，頁11b；吳彌光編，《勝朝遺事彙編》（光緒九年〔1883〕刊本），頁11b。《天潢玉牒》「二子」說亦有兩種版本，收入袁聚編輯，《金聲玉振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嘉靖鈔本影印，1996〕，史部第19冊），頁11a；鄧士龍編，《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據萬曆鈔本排印，1993），頁8。《天潢玉牒》無署撰人，但一般認為係主持重修《太祖實錄》的翰林學士解縉（1369-1415）所編撰；參考王崇武，《明本紀校注》（四川李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序〉，頁7。解縉傳見《明史》卷一四七，頁4115-4123；Chan Hok-lam, "Hsieh Chin," in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I: 554-558. 又參商傳，〈論解縉〉，《明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1991）：141-158。

⁴¹ 〈燕王令旨〉原件收入姜清，《姜氏秘史》（有萬曆乙未〔1591〕跋，收入胡思敬編輯，《豫章叢書》，南昌編刻局印行，1915），卷二；又散見《奉天靖難記注》及《明靖難史事考證稿》，第二章。〈令旨〉為「報父仇事」檄文有言：「余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忝居眾王之長。」見《奉天靖難記注》，頁92。明太祖制定繼統之法例見《皇明祖訓錄》及《皇明祖訓》，收入吳相湘主編，《明朝開國文獻》第3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5），頁1633，1718；參見《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頁107。

⁴² 關於永樂編纂宣傳「靖難」官書及竄改《太祖實錄》不利燕王繼統記載，詳見《明本紀校注》、《奉天靖難記注》及《明靖難史事考證稿》等書有關章節；又見陳學霖，〈明太祖「龍飛」官史「塑像」之分析〉，收入《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章。

《棗林雜俎》、《國權》，及張岱 (1597-1684)《陶庵夢憶》、李清 (1602-1683)《三垣隨筆》等紛紛徵引《南京太常寺志》考證其事。劉獻廷 (1648-1695)《廣陽雜記》又轉載明司禮太監言：「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竇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妃，故隱其事。」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彤管篇·孝慈高皇后無子〉目下云：「孝陵饗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俱東列；碩妃生成祖文皇帝，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⁴³ 張岱及李清更分別於壬午 (1642)、甲申 (1644) 年親訪鍾山孝陵饗殿勘察。李清偕錢謙益 (1582-1664) 往訪，事後記云：「予閱《南京太常寺志》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語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則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啓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⁴⁴《南京太常寺志》的記載由是得到證實，清初纂修《明史》學者如潘耒章 (1628-1682) 及朱彝尊 (1629-1709) 都認同其說，《蒙古源流》的記載亦當出此。⁴⁵

上世紀三〇年代，中國史學界曾就永樂帝的生母問題展開一場激烈爭論，參加的都是當時北垣的名學者。傅斯年最先質難，他同意野史及《南京太常寺志》說成祖的生母並非高皇后，是碩妃，懷疑她是高麗妃子。朱希祖深信《實錄》及《天潢玉牒》等官書記載，肯定成祖爲馬皇后所生，並駁斥懿文太子爲李淑妃出說。吳晗及李晉華繼作，前者的結論爲：「高皇后無子，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爲李淑妃出，成祖、周王爲碩妃出，成祖爲高后所養，故冒稱嫡子，碩妃則行歷不詳。」後者比較傅、朱二文異同，支持傳說，亦同意碩妃爲高麗人之可能性。隨後傅、朱二人再撰文反覆辯論，仍重申己見。不過學界傾向碩妃爲成祖生母

⁴³ 此本《南京太常寺志》已佚，引文見何喬遠，《名山藏·典謨記六》（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崇禎十三年〔1640〕刻本，1971），頁355；談遷，《棗林雜俎·義集》（收入張鈞衡編輯，《張氏適園叢書初集》，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頁1上；《國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卷一二，頁847；及張岱，《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一，頁1；李清，《三垣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49等。劉獻廷引述故明內廷人語收入《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82。

⁴⁴ 見《陶庵夢憶》卷一，頁1；及《三垣隨筆》，頁249。

⁴⁵ 見潘耒章，《國史考異》（《叢書集成》本，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卷四，頁89；及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卷四四，〈《南京太常寺志》跋〉，頁16b-17a。

說，而邵循正以英文撰作探討永樂帝的血緣，肯定碩妃不是元順帝的皇后，而是太祖一名屬弘（洪）吉刺部的蒙古皇妃。至八〇年代周清澍撰文就蒙古流行傳說再加檢討，此問題已得到定論。⁴⁶

這個始出《蒙古黃金史》的永樂帝為元順帝遺腹子傳說，就是以明成祖為弘（洪）吉刺部的蒙古小皇妃所生之史實，加以各種漢蒙兩族的附會發展出來，今本〈元太子〉故事的演變就代表其中過程。故事許多的枝節都可從明人的記載得到印證，例如前言明太祖找占卜者為他的兩個兒子算命一事，便可從「靖難」的政治神話及野史傳聞尋溯史源。明人有兩則記載相士預卜燕王和建文帝的命運。姚廣孝為名相士袁珙（1335-1410）撰〈柳莊袁公墓誌銘〉，就載傳聞謂珙曾為燕王朱棣看相，指出其為真命天子。語云：「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但年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即登寶位。」⁴⁷ 黃佐（1490-1566）《革除遺事》則說傳聞建文帝誕生時形相顯示大難，因此太祖為其逃難作出準備。言曰：「建文君之生也，頂顛頗偏，高皇帝知其必不終。嘗匣以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郎瑛（1487-1566+）《七修類稿·建文君》條又有類似記載：「太祖……見建文頭顛頗偏，匣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這些深入民間有關「靖

⁴⁶ 見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1931)：406-414；6.1(1936)：79-86。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2.1(1933)：1-13；〈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碩妃說〉，《東方雜誌》33.12(1936)：5-19。吳晗，〈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北平）10.3(1935)：631-646。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1936)：45-53，55-77等。又見 J. S. Shaw（邵循正），“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1937): 492-498；及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刺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見前注9。

⁴⁷ 姚廣孝撰，袁珙〈墓誌銘〉，收入焦竑纂輯，《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1965），卷七〇，頁48上。袁珙評語其後轉錄於《奉天靖難事跡》卷一，見《奉天靖難記注》，頁2-4；及張輔等監修，《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卷一，頁1-2。其他有關記載見祝允明，《野記》，收入李棣編輯，《歷代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影涵芬樓覆萬曆刊本，1940），頁22a；及陸燾，《庚巳編》，收入《紀錄彙編》卷二六四，頁2b-3a。袁珙傳記見《明史》卷二九九，頁7642-7643；又參 Chan Hok-lam, “Yüan Kung,”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II: 1638-1641.

難」的傳聞，不難流入蒙古草原，可以解釋〈元太子〉故事何以將二人相命之事組合一起，編造新的歷史面貌。⁴⁸

(四)

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他們並不和睦，不斷爭吵和打架。就在那時皇妃患了病，在垂危之際她把大兒子元太子喚來，交給他兩封放在不同「信筒」⁴⁹的信件，說道：「這是我的遺囑，在你榮顯的時候開讀一個信筒，在你遇到苦難時開讀另一個信筒。」隨後，一天夜間，朱洪武皇帝在睡著時作了個夢，夢見一條黑斑蛇同一條黃斑蛇凶猛地打架，然後一起走到父皇雙膝蓋倚下：在右邊的黑斑蛇繼續打在左邊的黃斑蛇，黃斑蛇昏了抬不起頭，蹣跚退後。夢醒之後，他覺得很懷疑，於是把占卜者喚來解夢。但是卜者立刻想到，皇帝顯然已知道答案啦！接著，在吵鬧和打架的真太子和元太子兩個一同來到父皇跟前，元太子倚在他的右膝蓋，真太子則倚在他的左膝蓋，互相申訴彼此的不是，然後離開。

皇帝感到很懷疑，於是召集眾多大臣前來，告訴他們這個夢，且說兩個兒子曾在他的面前爭吵。他們就說：「假使老大和老二肯定都是同父的兒子，他們沒道理如此失和，當我們想到占師為他取的名字，而現在〔元太子〕又與真太子不和好，可以肯定他就是蒙古合汗的兒子，一定要作個決定行事！」皇帝跟著說：「當他在孩提時，我已愛惜他視同己出，為此要跟你們磋商怎樣除掉他但不要加以傷害。」當皇帝還在思量，眾大臣進言：「讓他進駐蒙古敵人會取道入侵的南口岔，給元太子一千名士兵；倘若你下令把黃河裏的船隻運走，元太子可能會掉進河裏淹死；如果他轉頭回來，根據法律會以違背旨令被處死。」

大家在發言時，皇帝已作出決定，立刻將元太子召來，說道：「由於蒙古敵人的軍隊將會取道南口岔〔入侵〕，你，我的兒子，應該率領一千名兵

⁴⁸ 見黃佐，《革除遺事》，收入《金聲玉振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7冊），卷一，頁8a；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一二，頁185。

⁴⁹ 「信筒」一詞，Serruys原譯為“envelope”，漢譯本應作「信封」，但蒙文音寫為 *qabtargh-bichig*，英譯作“letter-container”，因此譯為「信筒」。*qabtargh-bichig* 一詞原出突厥語，見 Henry Serruys, “*Ho-po, ho-pao* ‘pouch’: Turkic *gap, xap*,” *Oriens Extremus* 15(1968): 135-148.

士去防守。」皇帝說了以後，〔元太子〕接到旨令和一張弓便告別，他隨即想：「這是我受苦難的時候了。」因此打開母親給他其中的一封信件，內裏說：「當你被徙放到南口岔去駐防的時候，任命劉伯溫為大臣，把他帶同一起去，並且要聽從他的指示。」元太子隨後到了父皇跟前，拱拜並哭泣著說：「你的兒子遵從父皇的命令到邊境去，但請皇上賜給我劉伯溫〔為隨從〕。」皇帝一向對〔元太子〕很有好感，想到他是自己的兒子，於是心軟起來把劉伯溫賜給他。⁵⁰

這故事口述本內容相若。⁵¹ 洪武皇帝的夢亦載於十七世紀下半葉的蒙古史籍，但是故事卻變成二龍搏鬥。前述《蒙古黃金史綱》說：

洪武皇帝曾夢見二龍搏鬥，而西龍為東龍所勝，敕令筮者卜其吉凶。筮者說：「此非二龍，而為君之二子。居西者，屬漢后之子，居東者，則蒙古哈屯之子，將繼君之寶座而享有天命。」⁵²

羅（卜）桑丹津的《蒙古黃金史》又載：

洪武可汗就作了一個夢，夢見有兩龍相鬥。北邊的龍勝過了南邊的龍。就叫卜者解說：「我這夢是吉還是凶呢？」卜者說：「那不是兩條龍，是你的兩個兒子。南邊的龍是漢族夫人的兒子。北邊的龍是蒙古夫人的兒子，〔他〕有坐你汗位的命運。」為了卜者的話，洪武可汗就想：「雖然同樣都是〔我的〕子嗣，可是他的母親，曾是敵人的夫人，由他生的兒子來坐我的汗位，實在不好。」就叫〔他〕從宮裏出去，在長城的末尾，建造呼而浩塔（Qöqe Qota）城住在那裏。其後洪武可汗在位三十一年之後就死了。⁵³

原來的二蛇打架何以變成兩龍相鬥？札奇斯欽譯注《蒙古黃金史》認為這是漢化的影響所致。他的解釋說：「龍為可汗的象徵，所謂『真龍天子』之說，在蒙古並不存在。龍王（Loos）不過是一個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的一個地方神祇，並不受到特別尊敬。所以這傳說是漢化，或內地化的神話，不像蒙古的原裝品。」甚有見地。⁵⁴

⁵⁰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3-44.

⁵¹ 見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4-135; *Folklore Ordos*, pp. 191-192.

⁵² 《漢譯蒙古黃金史綱》，頁46注云：「這裏影射的乃是永樂、建文二帝爭位之事。」隨引山本守，〈永樂帝と建文帝〉，頁107-117。

⁵³ 見《蒙古黃金史》，頁308；又見《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87。

⁵⁴ 見《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86注。

事實上，這則故事的幾個主要情節，在明代野史中都有蹤跡可尋。

其一，關於明太祖見二龍相鬥之夢，正德（1506-1521）陳槐《聞見漫錄》記云：「我太祖……忽夜夢升奉天殿，見一黃龍抱東柱，黑龍抱西柱，二龍盤旋，黃龍下而黑龍升，心甚異之。次日朝罷，日中升殿，偶見太子懿文服黃袍抱東柱，太宗服黑袍抱西柱，而心遂動……」嘉靖（1522-1566）范欽（？）《隨言》亦記述劉率古言云：「高皇夢二龍繞于庭，一奮而張，一俛而頓；既覺，實懿文、燕邸同游，而文皇厭飛龍焉。」皆以二龍的相鬥比喻太子朱標與燕王朱棣的失和。⁵⁵ 未幾，故事又附會於建文帝與成祖影射「靖難」的鬥爭。郎瑛《七修類稿》引黃佐《革除遺事》記：「太祖一夕夢二龍鬥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成祖同戲，建文君著白，心知後必不協。……」嘉靖《建文遺蹟》描述更鋪張：「太祖嘗因夜夢二龍入殿搏擊，其黃者勝而氣，其白者負而入蟻。明旦，太皇視朝，見皇太孫居殿右角，燕王待於左前。太祖見之，怒，以王位居太孫，上始知其有奪嫡計。」⁵⁶《蒙古黃金史》報導太祖見二龍相鬥之夢無疑受上述傳言的影響，而〈元太子〉故事僅言二蛇爭吵打架，又回復到大漠草原的傳統。

其二，蒙古皇妃留書元太子應付危難，類似明太祖留給建文帝錦囊在危難時依計逃生故事。正德梁億《傳信錄》記述劉基（1311-1375）應太祖請留交建文帝一個灌鎖的篋：「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汝有何術以教朕使守天下？』基對曰：『有。』因成一篋，用錫汁灌鎖，戒後世，非有大故，不可開。後靖難師至，建文開篋視之，則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披剃而遁。」（案：劉基即劉伯溫）王世貞（1526-1590）引王鏊（1450-1524）《震澤記聞》及王泌《東朝記》亦有類似記載。《建文遺蹟》記敘至詳，說云：「太祖臨崩，治命密勅一封櫃，召太孫曰：『此櫃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啓視之，即無害也。』至是，靖難師將逼，啓視其櫃，見一刀一度牒，上有勅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他處爲僧。後宮某處有密地可通，汝其不然，將刃自

⁵⁵ 見陳槐，《聞見漫錄》（收入張壽鏞編輯，《四明叢書》第四集，民國四明張氏約園刊本，1936），卷上，頁2a-2b；范欽（？），《隨言》（嘉靖十一年〔1532〕，收入姬佛陀輯，《廣倉學窘叢書》，上海：倉聖明智大學，1916），〈甲類〉，第一集，上，頁1b。

⁵⁶ 見《革除遺事》卷一，頁8a；《七修類稿》卷一二，頁185；大嶽山人，《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內文作《建文遺蹟》，嘉靖辛卯〔1532〕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舊鈔本，1969〕），頁8。

盡。」於是少帝徑削髮以逃，天下之人實皆不知其生也。」⁵⁷ 由於蒙古人同情元裔燕王，因此在吸收漢人傳聞時，不期然把建文帝的故事移植到那裏。

其三，關於元太子出戍要求劉伯溫隨行之說，可能是將姚廣孝當成了劉基。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縣人，他是明太祖的帷幄輔佐，機密軍師，學富五車，精於謀略兵法，元末征戰群雄時隨軍定策決計，屢建奇功。太祖登基後拜御史中丞，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未幾告老還鄉病卒，譽為一代大儒佐命名臣。但在民間傳說裏，他以其字伯溫知名，是一位通曉天文曆算，逆知未來的占卜星相家，撰作不少陰陽術數奇書，並且遺下《燒餅歌》讖書，預言滿清滅亡的神祕傳奇人物，坊間還流傳他畫圖建造北京城。⁵⁸ 姚廣孝 (1335-1418)，蘇州長洲縣人，初從釋氏，名道淵，深通權謀術數兵法，太祖封朱棣燕王時，命以高僧身分相隨，為燕王定策起兵「靖難」建立大功。郎瑛《七修類稿·靖難功》載：「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佐，當使殿下戴一白帽。』」（原注：「王字上加白字。」）於是奏討之。」便指出姚廣孝輔助帝業的機遇。燕王即位後拜太子少師，復其姓並賜以今名，永樂初監修重修《太祖實錄》及《永樂大典》，其後退隱京師慶壽寺以終。⁵⁹ 但到明中葉後，反對其篡奪繼統及同情建文遜位者日眾，不少「靖難」功臣受到責難，而姚廣孝首當其衝，成為民間揶揄的對象。反之，劉伯溫日益神化，在民間傳說是一位家喻

⁵⁷ 見梁億，《傳信錄》，收入佚名編輯，《九朝談纂》上冊（《清代禁燬書叢刊》第一輯〔臺北：偉文圖書公司影清抄本，1977〕），頁266-267。王鏊《震澤記聞》通行本未載有關傳說，引文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萬曆十八年〔1590〕刊本，1965），卷二一，頁2b-3a。類此故事又見王泌，《東朝記》，收入孫幼安纂，《稗乘》（《百部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5b；《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頁25。

⁵⁸ 劉基的事跡見《明史》卷一二八，頁3777-3782。近人著述見劉德隅，《明劉伯溫生平事跡拾遺》（臺北：自印本，1976）；Chan Hok-lam, "Liu Chi,"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I: 932-938；又見郝兆矩、劉文峰，《劉伯溫全傳》（大連：大連出版社，1994）。關於劉基傳說的發展，詳見陳學霖，〈關於劉伯溫傳說的研究〉，及同作者較早對劉伯溫《燒餅歌》的研究數篇，俱收入《史林漫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下編〉，第九至十二篇；又見前注10所揭中英文有關論著。

⁵⁹ 姚廣孝的事跡見《明史》卷一四五，頁4079-4082。《七修類稿》引文見卷一一，頁164。近人研究見牧田諦亮，〈道淵傳小稿〉，《東洋史研究》18.2(1959): 57-79；及Eugene Feifel, "Yao Kuang-hsiao,"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II: 1561-1565。又見Heinz Friese, "Der Mönch Yao Kuang-hsiao," *Oriens Extremus* 7(1960): 158-184；及商傳，〈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3: 119-130。

戶曉的神奇人物，有說他能知五百年的過去未來，是一位大預言家，姚廣孝與他無可倫比。本來伯溫卒於洪武八年（1375），與故事時代不符合，不過，他在明代的地位超越凡人，很多漢人流行有關建文帝出亡的傳說都有他的份兒，因此蒙古民間故事把他吸收過來，說明蒙古族對他同樣熟悉，同樣喜愛借用附會這位傳奇性人物。⁶⁰

其四，關於蒙古皇妃留言揭露身世事，明初對成祖生母尚無異說，但周清澍檢出兩則可能為蒙古故事出處的資料。一則是明人流傳朱元璋子潭王朱梓（1369-1390）為國初梟雄陳友諒（1320/1321-1363）遺腹子之說。皇甫錄（1470-1540）《近峰聞略》記：「〔王〕文恪公〔鑒〕言，高帝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其妻子閼氏，可沒入掖廷。』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於長沙。將之國，閼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他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根據王世貞考證，潭王之母為定妃達氏，非閼氏。又王生於洪武二年（1369），距陳友諒之死將十載，不可言「遺腹」。此說當是後人捏造，不過流傳一時。⁶¹另一則是到了清末，蒙古〈元太子〉的故事又傳回內地，成為好事者的談助瑣聞。例如王謩《瓠蘆雜綴》說：「成祖生母為翁吉剌氏，……挹鬱而歿。易簀前，以己之畫像一幀授成祖乳母，且告以詳，命于成祖成年就國後告之。成祖封燕王，乳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之來歷，乃投袂奮起，而靖難之變作矣。」就是從這些蒙古傳說脫胎而來。從這些文獻記載，我們可以窺見蒙漢兩族共同創造和充實這個故事的一些軌跡。⁶²

（五）

眾大臣為元太子挑選軍隊，給他的是一千名殘弱的士兵，一千件破舊的胄甲及武器，和一千匹疲頹的馬，指令他從南京城出發。但在此前，已下令

⁶⁰ 關於明清民間對姚廣孝的印象及與劉伯溫的比較，參見《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頁46-53；及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頁118-121。

⁶¹ 皇甫錄《近峰記聞》此則未見現存節本，引文據《弇山堂別集》卷二〇，頁7a-7b（考證見頁8a）。原文又收入皇甫錄另著《皇明紀錄》，見《歷代小史》卷八五，頁29b。參見吳晗，《朱元璋傳》，頁280。

⁶² 王謩《瓠蘆雜綴》筆者未見，今從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卷九，頁112-113引。參考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頁17。

把黃河的船隻都收集起來，當元太子及士兵上路抵達黃河，發現所有的橋樑和船隻都走光。他於是在鄰近駐紮，派人去探查黃河是否結了冰。當探子回來報告河沒結冰，〔太子〕便把他就地處決。每天早上，都派人去探查，但當有人來報告河沒結冰，他們都通通被殺死。

六天就如此過去。到第七天，一個被派去探查的人在想：「我們的元太子已慣了殺戮每一個報告河沒結冰的，在陰曆六月炎熱的狗兒日子裏河怎會結冰呢？無論如何我都會死，不特我被殺，所有的人都要死！」抱著這個念頭，他回來就報告河已牢固的結了冰，因此所有人立即動身。當他們抵達河堤時，元太子把那人喚來質問：「結冰的地方何在？就在那裏過河吧！」那人答道：「在這兒。」當他〔抱著決死之心〕下水時，駭異的是真的結了冰，因此所有人都一起渡過而沒有遇害。

他們緩緩前進，軍需和銀兩快要耗盡，但自從離開南京城後，無數〔沿途跟隨著的〕鴿子掩蓋著天空，每當元太子射殺牠們的一隻，牠就變成一塊銀錠。在這些眾多的鴿子飛翔和跟隨下，〔元太子的〕隊伍繼續前進，但當他們抵達「Jiu-jiu」（？）城的時候，鴿子就不再出現。⁶³

以上口述本記載大致相同。⁶⁴ 日文譯本在敘述元太子六月渡黃河遇到河水結冰的奇事增加一注說：「該河結冰故事，據細谷清《滿蒙民俗傳說》頁178-181所收的〈蟹的甲殼〉一文，是在唐太宗（627-649在位）征伐高句麗的時候，於三岔河發生的。再者，亦有清太宗（1627-1643在位）親征朝鮮之際，津江的冰突然堅硬起來的記載。見田中萃一郎《東邦近世史》上卷，頁94。這是同一類型故事而聯繫於不同人物的一個例子。」唐太宗征伐高句麗事在貞觀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年（645, 647, 648），至高宗總章元年（668）完成。清太宗親征朝鮮事在天聰十年（1636）。有關二者的史料都未見類此傳說記載，可能是從朝鮮傳來。按蒙古窩闊臺合汗（1229-1241在位）、蒙哥合汗（1251-1259在位）時代曾數次征服高麗（事在太宗三、四、七年、憲宗四年〔1231, 1232, 1235, 1254〕），兩國有密切的政治文化關係，這個故事從三韓傳來的歷史人物異聞移花接木是不足為奇的，不過如何發生尚待考究。⁶⁵「Jiu-jiu」城何在不詳，很可能是杜撰出來的。

⁶³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5-46.

⁶⁴ 見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4-135; *Folklore Ordos*, pp. 192-193.

⁶⁵ 見磯野富士子，《オールドソ碑集》，〈元太子、真太子〉，注5，頁39-40。引文見細谷清，《滿蒙民俗傳說》（東京：東龍閣，1936），頁178-181；田中萃一郎，《東邦近

(六)

元太子及隨從抵達到南口的路上，就地休歇一會。一天，太子挽弓單騎出外，當他到達「Jiu-jiu」城近郊，在那些鴿子曾經追隨的地區尋索之際，突然遇到一個黑臉、穿黑衣、騎黑馬的異人。他對〔元太子〕說：「孩兒，把你的弓和箭交給我。」〔太子照辦〕，那人跟著向四方各射一矢，隨曰：「箭落的地方四周有大量金銀珍珠的寶藏，把我的紅矛交給劉伯溫，倘若缺乏銀子，他以矛掘地約一肘之深，各種珠寶即隨土而出。」〔繼續又說〕：「你應任命劉伯溫為丞相，在此地建造一四隅的大城來配合春秋四時，外城建造九道門來配合行星的數目，內城建造八座門來配合『八卦』，建造十二條大街來配合一年月的數目，建造三百六十條『衙衙』(qutung) 以配合日的數目，又建造二十七（原譯者注：應如口述本作『八』）座衙門以配合星宿的數目。又在城的中央建造一處金殿，內裏設置一座鑲有九條蛟龍的玉製御位，你自己坐上去做皇帝！」說完指示，他把紅矛交給〔太子〕即逝去無蹤。

聽到指示，元太子大喜，立即執著矛將事情告訴劉伯溫。他們趕往射箭的地方，找到四枝箭，便向地下挖掘，果然有發現，取得無數出土的金銀珍珠寶藏。元太子從他帶領的一千士兵中選出五名善於技藝的工匠，委任他們為大臣，通過這些珠寶匠的串連，他把很多能士召集為他使用。在劉伯溫的示範和指導下，他們開始建城，不久，便完成一座有如那位黑騎士所說有九道門的大城。跟著，〔劉伯溫〕供奉元太子為「小皇帝」，請他坐上那座放置於金殿鑲有九條蛟龍的玉製御位，然後稱這座城為北京。劉伯溫把從紅矛指著的地方發掘到的各色珠寶充實了皇帝的金庫，又把榮銜和俸祿發給貧苦大眾，因此四方的人民都忠耿地跟從〔「小皇帝」〕。⁶⁶（案：這裏稱元太子為「小皇帝」是因為當時的皇帝是「真太子」，歷史上的建文帝。）

世史》（東京：東邦協會，1900-1902），上卷，頁94。關於唐太宗、高宗征伐高句麗的經過略見高明士，〈從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韓關係〉，收入張存武等著，《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頁123-126。清太宗親征朝鮮的經過略見孫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頁191-198。蒙古歷次侵略高麗事跡略見王民信，〈蒙古入侵高麗與蒙麗聯軍征日〉，收入張存武等著，《中韓關係史論文集》，頁188-210。

⁶⁶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6-47.

以上口述本記載大致相同。⁶⁷ 這裏所敘述北京城的興建，顯然荒誕無稽，主要敷演永樂為元順帝皇妃所生的流言，摭取蒙古社會關於都城始源的俗聞，與暢行中土關於劉伯溫的神奇怪誕傳說混合，把明代京城的建置歸功于黑臉異人的指示。這位異人，根據筆者研究，就是真武神的化身。真武原名玄武，原是上古北方七宿之一，到漢唐間由於道教方士附會，與北方水神黑帝顓頊混合，變為鎮守北方之神，受到歷代帝王的崇祀供奉。到宋真宗（998-1022在位）時，為迴避奉為帝室始祖趙玄朗的諱名，因更名真武，而所供奉的廟自此稱為真武廟。明太祖已經崇祀真武神，到了朱棣繼位為永樂帝，在謀臣釋道淵（姚廣孝）的宣傳下，自詡在起兵「靖難」之時，獲得真武神的陰助，因此掌握樞機，師旅凌厲，每戰皆捷。功成之後，為要酬謝神恩，強化政權的合法性，於是在永樂十三年（1415）、十六年（1418）分別下詔在北京內城和湖廣的武當山興建真武廟，並且御書碑陰隆重其事。例如永樂親撰的北京《御製真武碑》便說：「肆朕肅清內難，……神之陰翊默贊，掌握樞機，幹運洪化。擊電邊霆，風驅雲散，陟降左右，流動揮霍。燿燿洋洋，濱濱紛紛，翕斂恍惚，蹟尤顯著。」在湖北建立的《御製太嶽太和山道宮之碑》亦言：「天啓我國家隆盛之基，朕皇考太祖皇帝以定一旅，神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其跡甚著。」自此真武神翊助永樂「靖難」創業的傳說，便在民間廣泛展開。蒙古人流傳黑臉異人指授元太子、任用劉伯溫監工建造北京城的故事，顯然是演繹這個流行中土關於永樂皇帝的傳說。⁶⁸

故事所陳黑臉異人取去燕王的弓和箭向四方各射一矢，揚言箭落的四周地下埋藏無數金銀珍珠，可作建城之用云云，無疑是摭取蒙古族「箭程劃地界」的風俗加以渲染增飾。蒙古人是遊牧民族，以放牧羊馬、獵取野獸為主要生計，日常工具不離馬匹與弓箭，不但用於行獵戰鬥，而且產生許多相關的習尚，「箭程劃地界」便是顯著的一種。《元史》列傳有兩則有關記載，首則見〈札八兒火者

⁶⁷ 見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p. 135-136; *Folklore Ordos*, pp. 193-194.

⁶⁸ 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見黃兆漢，〈玄帝考〉，收入同作者，〈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頁39-44。又見陳學霖，〈「真武神·永樂像」傳說溯源〉，收入《明代人物與傳說》，頁87-127。永樂帝親撰的北京《御製真武碑》及在湖北建立的《御製太嶽太和山道宮之碑》同收入《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附錄》（收入《正統道藏》〔上海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藏明刊本，1924-1926〕，第608冊），頁1a-3b。又見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250, 1251。

傳)。札八兒是西域一回族族長，雄勇善騎射，早年從元太祖鐵木真起事，同飲班珠尼 (Baljuna) 河水，與諸王大會斡難河 (Onan) 上成吉思汗 (Činggis Qan) 尊號。壬申年 (1212) 太祖謀略漢地，奉使金廷勸諭國主宣宗 (1213-1224在位) 歸順 (事在甲戌年〔1214〕)，不報，遂獻策大軍攻破中都 (燕京)。太祖以其功多，遂謂札八兒：「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汝爲己地。」不過其傳失載他的封地所在。另一則見〈鎮海傳〉。鎮海 (?-1252) 爲怯烈台氏，亦出身軍伍，與鐵木真同飲班珠尼河水，偕諸王大會斡難河上太祖尊號。隨後征戰四方，平定諸部，所俘生口數萬悉以上獻。壬申年從太祖謀定漢地，屢建功勳。中都破後，太祖便以京城之地賜封，一如札八兒之例。許有壬 (1287-1364) 撰〈元故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并序〉云：「(命鎮海) 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舍悉以賜之」，透露當日鎮海立於大悲閣上挽弓放箭。大悲閣建於唐代，遼更名聖恩寺，金元兩代有重修，元時轄屬大都之南城，即今日北京廣安門外大街甘石橋之東，鎮海的封地，應在此地的周圍。從上可見，成吉思汗係援用蒙古「箭程劃地界」的風俗，使受領封者張弓向四方各射一矢，就其人的臂力或運氣，視箭落的遠近劃分采土的大小，反映蒙古游牧社會賜封的民主制。近人根據有關記載考證，蒙古人大拽弓箭的射程在300至500公尺之間，照此可以推算這些以「箭程」決定的封地面積。⁶⁹

這種「箭程劃地界」的習俗，又在元世祖忽必烈合汗營建大都城時出現。記載稱在至元十六年 (1288)，當大汗延請尼泊爾國的建築師阿尼哥 (Araniko, 1244-1306)，在京城西北角遼代的白塔寺舊址上，建造一座供奉喇嘛教的白堊色浮圖塔落成後，決定擴建寺院，親自以白塔爲中心點，環射四矢，劃定新寺的地界。(釋) 念常 (1282-1344) 編纂的《佛祖歷代通載》云：「帝建大聖壽萬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爲界至。」這座新寺隨命名大聖壽萬安寺，元末燬於火，明宣德、景泰間分別重修塔寺，改名妙應寺，俗稱白塔寺，今日尚存，位于北京阜城門內大街路北。它的面積，有學者據當時的一箭步約是200公尺推算，寺院的南北與東西的長度各爲400公尺左右，總面積就可能達到16萬平方公尺或0.16平方公里，並具一說。〈元太子〉故事並無提到所建都城的面積，但是若要估量蒙

⁶⁹ 關於這種習俗的研究，詳見陳學霖，〈蒙古「箭程劃地界」習俗考索〉(1994) 及〈「一箭之遙」證史〉(1994)，重刊於《史林漫識》，頁3-36, 37-52。史料引文見《元史》卷一二〇，頁2960, 2964；許有壬，《圭塘小稿》(《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〇，頁8a。

古人挽弓向四方各射一矢，照箭頭落下之地畫出一個四方地形，它的大約面積亦應作如是觀。⁷⁰

至於故事說那位黑臉異人指授劉伯溫：「在此地建造一四隅的大城來配合春秋四時，外城建造九道門來配合行星的數目，內城建造八座門來配合『八卦』，建造十二條大街來配合一年月的數目，建造三百六十條『衚衕』以配合日的數目，又建造二十七（案：應該是『八』）座衙門以配合星宿的數目。」這個藍圖並非出於想像，而是反映北京城的規劃與星象、陰陽五行、八卦等宇宙秩序的配合。這種天人合一、風水調和的觀念，歷來是中國古代建築城市的指導思想，在許多著名的都城都顯現出來。蒙古人迷信天象、星宿、風水一如漢人，而在鄂爾多斯地區曾發現占卜星相一類蒙古文書，因此故事描述北京城的規劃，表現這種陰陽思想的落實安排就不足為奇。⁷¹

（七）

在這當兒，朱洪武皇帝終於南京城。元太子隨著眾多大臣和那一千名士兵進入京城瞻仰父親的遺容。但在此前，他的幼弟真太子，已經登上父親的皇位，一聽到長兄元太子已經帶領士兵來到，還未了解情況，就想起以前他們的過節，說道：「他肯定會來殺我和奪取政權。」因此，在這樣偏激的念頭下便自縊身亡。元太子抵達南京之後，他披掛大孝向父皇的塋墳致祭；跟著，他預備和幼弟真太子見面，但在詢問之下，大臣回報噩耗。他痛哭流淚，說道：「現在我的弟弟已經死去，甚麼都沒有意義了！」於是

⁷⁰ 見《元史》卷七，〈世祖紀四〉，頁114；卷一五，〈世祖紀十二〉，頁311；（釋）祥邁，《至元辯偽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16號），卷五，頁779b-781a；（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同前書第2036號），卷二二，頁723b。參見楊毅，〈射箭畫寺界、跑馬關山門——元大都聖壽萬安寺規模瑣談〉，《燕都》1985.1：24-25。阿尼哥傳記見《元史》卷二〇三，頁4545；參考石田幹之助，〈元代工艺家ネベルの王族阿尼哥について〉，《蒙古學報》2(1941)：244-260。

⁷¹ 現代學者對這個課題的著作不少，論述北京城的可見于倬雲，《紫禁城宮殿》（香港：商務印書館，1982），〈專論〉，頁18-28；及姜舜源，〈五行、四象、三垣、二極——紫禁城〉，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史探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頁251-260。田清波神甫曾在鄂爾多斯地區購到一本用作占卜星相的蒙古文書並作初步研究，見Antoine Mostaert (ed. and annot.), *Manual of Mongol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 Scripta Mongolica 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他挑選一位總督，委任他去管治南京城，之後，他回去從南面的門進入北京城。跟著，元太子擇了個吉日，宣稱為「大皇帝」（蒙文為 *gaghan* [合汗、合罕]）並取了大明永樂皇帝的名號，統治著漢人的十三個省和創立大明國的政府。⁷²

口述本故事有類似記載：

那時，真太子在父親死後自己稱帝即位，突然聽到兄長要來他那裏的傳言，心裏在想：「這次兄長過來，一定是打算向我尋仇，奪我的帝位！」當其兄到達之際，真太子便在樹上上吊自盡。元太子進入都城，在父親的墓前拜祭後，說「要跟弟弟見面」。那裏的侍役告訴他：「真太子已經自縊身亡。」元太子聽到弟弟的噩耗，十分悲傷。他把弟弟的屍體埋葬後，便從南京出發往北京，從北京城的正門進入，稱帝即位。

以上所講關於朱洪武皇帝死後，元太子隨入京城奔喪，而已經登位的真太子，聽到長兄帶同士兵入城，想起以前和他的過節，恐懼起來自縊身亡；及當元太子抵達南京，向父皇的塋墳致祭後，得知真太子的噩耗，痛哭流淚，於是委任一位總督去管治南京城，之後返回北京城成為「大皇帝」，統治十三個省和創立大明國的政府。這些情節反映一些歷史情況，但亦有明顯的缺漏，并摻雜不少傳聞，混淆事實，製造一些假象。

首先，洪武皇帝死後，「真太子」立即登位是事實，因為太祖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標逝世後，立其正妃所出的次子允炆為皇太孫，即以其為法定的繼承君主，因此太祖於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1398.06.24）殯天，辛卯（1398.06.30）朱允炆即登帝位，改元建文。其次，洪武皇帝死後，究竟「元太子」燕王有無如上說率領士兵入京城奔喪，官書野史記載相反。永樂的官書《奉天靖難記》，載燕王指斥建文帝矯命止諸王奔喪，以父死未獲臨葬為出兵藉口，據此則燕王並未入朝。但是野史如鄭曉（1499-1566）《遜國臣記》則引當日御史言燕王實已入朝，而且行皇道入倨傲不拜，極為不敬，各執一辭。王崇武引朝鮮《定宗實錄》元年（1399）三月記載遼東朝鮮逃人報告，考證燕王以拜祭太祖高皇帝為由，率師赴京，但新皇帝有備，只許令其單人入城，燕王恐怕有變，於是到京師後折返，則是兩全其說。蒙古故事說元太子隨著眾多大臣，和一千名士兵入

⁷²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7-48.

京城瞻仰父親的遺容云云，顯然正確地反映這件歷史事實。⁷³

故事跟著說，真太子在得悉元太子率兵入城奔喪，想起從前與他的過節，懼怕起來自縊身亡；這一事純是虛構，掩沒了燕王的「靖難」之變，以及建文皇帝在燕兵攻陷南京後不知所終的事實。按永樂官書記載，建文帝即位後推行「削藩」政策，燕王自覺勢危，於是以朝廷內有姦臣把政奪權，改變祖宗體制為藉口，舉兵「靖難」，大軍節節得利。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兵直下南京，守將變節，都城陷落，宮中火起，帝后不知所終，後來出屍體於火中，燕王詔以天子禮隆葬。不過，清修《明史》則據野史云建文帝由地道出亡，英宗正統五年（1440），有僧自雲南至廣西詭稱為建文皇帝，地方知府聞於朝，按問，知是鈞州人楊行祥，年已九十餘歲，詔下獄，未幾亦庾死，不過自後滇、黔、巴、蜀間均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遺跡。由此可見，歷史上的「真太子」並非自縊身亡，而是下落不明，至於自縊之說，恐怕是將明末的思宗皇帝朱由檢（1628-1644在位），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04.25）流賊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後，在宮城煤山上吊殉國的事情移花接木！⁷⁴

最後，文獻本和口述本敘述「元太子」在「真太子」死後的事情，除卻說他將「他的弟弟」（其實是他的姪兒建文皇帝）的屍體埋葬後，擇個吉日，登位為大明永樂皇帝之外，都是與史實不符合。根據《太宗實錄》（《明史·成祖紀》本此），建文四年（1402）六月己巳，〔燕〕王詣奉天殿即皇帝位；壬申，葬建文皇帝；七月壬午詔以明年為永樂元年（1403）。元年正月辛卯，以北平為北京；二年（1404）正月己巳，召世子高熾（後之仁宗，1423-1424在位）還京師，四月

⁷³ 《明史》卷三，〈太祖紀三〉，頁55；卷四，〈恭閔帝紀〉，頁59。詳參《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頁46-53。史料引文見《奉天靖難記注》，頁14；鄭曉，《〔建文〕遜國臣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五，頁8b（曾鳳韶傳）；朝鮮《定宗實錄》（東京：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影刊本，1953），卷一，頁6a-b。

⁷⁴ 見《奉天靖難記注》，頁208；《明史》卷四，頁66。關於燕王以「靖難」藉口篡奪建文帝位始末，詳見《明靖難史事考證稿》；及 David B. Cha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1398-1402*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建文帝出亡或「遜國」事詳見孟森，〈建文遜國事考〉，收入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世界書局，1961），頁1-12。又見倫明，〈建文遜國考疑〉，《輔仁學誌》3.2(1932)：1-62。近人對此題目論著甚多，良莠不齊，不予敘錄，但可參考徐作生，《泛槎考述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第六篇，〈建文帝亡命何方〉，頁162-259。明思宗殉國事見《明史》卷二四，〈莊烈帝二〉，頁335；參見張德信、譚天星，《崇禎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頁393。

甲戌，立爲皇太子，而永樂帝遲至七年（1409）二月壬午始發京師，皇太子監國，三月壬戌，還至北京。⁷⁵ 如是永樂帝一直留駐南京，仍然以之爲京師，七年後始返回北京。蒙古故事說元太子在把弟弟的屍體埋葬後，便從南京出發往北京，從北京城的正門進入稱帝即位，是說書者想當然的編造。

這裏須要一提，〈元太子〉故事刪去較早出的《蒙古黃金史綱》和《蒙古黃金史》等書描述相傳永樂可汗率領他的蒙古「伴當」，組織軍隊，前去捉住漢族洪武可汗的兒子建文帝，把他放逐而自立爲大明國正統「大汗」的情節。此點《蒙古黃金史綱》描述說：

漢帝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後，弘吉拉哈屯之子永樂皇帝，率領護衛與山陽之六千兀者人，水濱之三萬女真人以及黑城的漢人整兵來伐，擒獲漢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握銀印於頸而廢逐之。於是，烏哈噶圖可汗之子永樂皇帝爲君，而漢家卻認爲「真正吾皇之子作了皇帝」，號曰永樂大明。以擁立之功而賜予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案：指大都〔daidu〕城的人民而言）、女真人以千六百「大都」，云云。⁷⁶

羅（卜）桑丹津的《蒙古黃金史》記載尤詳：

他的兒子札兀刺（Ja'ura）可汗（譯者注案：即建文帝）在位四年之後，翁吉刺惕夫人的兒子永樂可汗，就率領他自己的少數伴當（nököt）、山南的六千蒙古人、水〔濱〕的三萬女真人，佔領了長城（Khara Kerem?）之地，組織軍隊，前去捉住漢族洪武可汗的兒子札兀刺可汗，在他的頸項上加蓋銀印，放逐出去。烏哈噶圖可汗的兒子永樂可汗佔了〔大〕位，我們〔可汗〕的子嗣做了中國正統的可汗。因為曾給永樂上過尊號「大明」（Daiming），〔且〕曾效過力的緣故，〔他〕就賞賜山南的烏濟葉特（Üchiyed）族三百份敕書（daidu）。這永樂可汗在位二十二年殞天。⁷⁷

⁷⁵ 《明太宗實錄》卷九下，頁135, 138；卷一〇上，頁145；卷一六，頁294；卷二七，頁499；卷三〇，頁539；卷八八，頁1170；卷八九，頁1179。《明史》卷五，〈成祖紀一〉，頁75；卷六，〈成祖紀二〉，頁79, 81, 86。

⁷⁶ 見《漢譯蒙古黃金史綱》，頁47-48。譯注2釋「大都」云：「原文 daidu，乃係『大都』音譯，似指大都城的人民而言。案：此處影射的，乃是明成祖割大寧衛以畀兀良哈三衛之事。」（頁48）

⁷⁷ 見《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88-189。註6釋「長城」云：「『長城』普通稱為 Chaghan Kerem——白牆子，唯此處稱為 Khara Kerem——黑牆子。」（頁189）註8釋「敕書」

《蒙古黃金史》的目的是要宣傳「烏哈噶圖可汗的兒子永樂可汗佔了〔大〕位，我們〔可汗〕的子嗣做了中國正統的可汗」，表示雖然末帝妥懽貼睦爾合汗被大明朱洪武皇帝驅逐，蒙古統治仍然在中國延續的假象。但是〈元太子〉故事旨在勾畫洪武皇帝兩個不同血統的「兒子」間的爭執，帶出「元太子」在北京建造都城的傳說，因此就如《蒙古源流》一樣，輕輕的迴避了中國記載有關「靖難」宮廷篡奪鬥爭的史事。⁷⁸

(八)

此後，永樂皇帝便統治一個偉大的政府，而在享受無限富貴的當兒，他打開前時母親留給他〔另外〕一封信件閱讀。內裏說：「你，我的兒子，確實是蒙古妥懽貼睦爾合汗的骨肉，由於我對『三寶』虔誠的祈禱，你就在我懷孕十二個月後誕生，因此你能夠活著成人。當你成為大合汗（『大皇帝』之意）時，別忘記你的祖先，凡事要為蒙古人多多著想，在崇敬最高神聖的『三寶』當兒，要使他們成為祭祀的對象。」獲悉實情之後，他私下十分關切蒙古人的處境。當時漢人攻擊蒙古時有把俘虜帶走、斬下他們的頭顱、割掉他們的心和肝臟，用作在八月十五日去祭月亮的習慣。據說永樂皇帝把這個習俗一起廢除，但因為漢人對蒙古仇恨太深，所以在堅決取締這個殺害和犧牲蒙古人的陋習的同時，他採用以切開一個西瓜和月餅的俗例取代。

隨後，永樂皇帝遣派特使到烏思藏，邀請宗喀巴大師來朝，但大師沒有應允，代替來的是一位名叫 Jamjin chorji sakiy-a yeshi（甲木慶曲結）的高僧。皇帝對他非常尊敬，把他作為供奉的對象。這位國師向民眾展示駭人的神蹟，同時以最高超的教義開導皇帝及皇后，然後敷及無量大眾，使其

(daidu) 言：「關於這一個字的問題，Henry Serruys 曾為《中國文化》（*Chinese Culture* 2.4 [1960]）撰寫 “Ta-tu, Tai-tu, Dayidu” 一文 (pp. 73-96)，論之甚詳，可參考。據他的考證，凡持有這種『敕書』的，可到邊卡交易或領賞賜。」（頁189）此段譯文又見《蒙古黃金史》，頁308-309，但將「敕書」譯作「璽書」，並無附注蒙文原文。

⁷⁸ 《蒙古源流》但言：「朱達噶雅庚戌年（1370）生，歲次戊寅（1398），年二十九歲即罕位，經四月又十八日，即於此戊寅年崩。因其無子，遂以蒙古夫人之子為主，歲次乙卯（案：應作『己卯』〔1399〕），年三十二歲即罕位。」與史實不符。見《〔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卷八，頁464。

超度塵世入於最高境界。在他大舉弘揚佛法之時，永樂皇帝的子孫一一嗣位，成為十三世代統治人民和保衛國家的偉大皇帝。

願所有的人都平安和豐裕；

願所有的善德都得到宣揚；

願所有期待的成就都能實現。

鈔畢於今朝（Badaraghultu törö；指光緒朝〔1875-1908〕）第三十三年（陰曆）四月十九日。（1907.02.27）⁷⁹

〈元太子〉口述本以前段故事為終結，並無繼續講述邀請宗喀巴及其弟子來朝的事情。此段記事略言：

在那時，元太子打開母親叮囑他顯榮時要看的信件。信件說：「你其實是蒙古皇帝的後裔。最後即位為皇帝的時候，務必要愛恤蒙古人。」元太子看過這封信後，就全面禁止漢人在八月十五日擄殺蒙古人，把他們的頭顱和肝臟祭祀月亮之舉，又阻止漢人因憎恨蒙古人而屠殺他們作為活祭的活動。他規定以西瓜和月餅代替蒙古人的頭和肝來祭祀月亮。自始以後，漢人便停止擄殺蒙古人。元太子在帝位時期，他一直愛恤蒙古人。⁸⁰

內容與文獻本類似，不過加重語氣，強調元太子在獲悉自己的真實身分後，不但禁止漢人在八月十五日擄殺蒙古人，而且更加採取行動愛恤和保護自己的同胞。

下段所說永樂皇帝遣派特使到烏思藏，邀請宗喀巴大師（1357-1419）來朝，但大師沒有應允，改派另一位高僧來代替，是指永樂六年至十四年（1408-1416）間，永樂政權致力籠絡前、後藏佛教領袖，意圖利用宗教懷柔蒙番各族，並借重其力量以建立明朝的聲威。按永樂六年，永樂帝遣特使王哲保等攜同禮物，到前藏延請新興的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進京。宗喀巴本名羅桑扎巴，後以所生地宗喀巴（Tsong-kha-ba）為名，三歲時從噶舉派黑帽系的第四世活佛受近事戒，七歲時受沙彌戒，取名羅桑扎巴，到十六歲時（1372），按習規到衛藏各地拜訪各家名師求深造，開始學習慈氏五論等顯教經論。二十歲時（1376），宗喀巴從尙師仁達瓦·董力奴洛研讀經律，盡得應成中觀學說旨要，到二十四、五歲時（1380-1381），便樹立了重視律義的觀念並接受比丘戒。隨後又專注研究密宗教法，成為西藏佛教史上少數能融會顯、密二教的大師。十五世紀初葉，宗喀巴針對佛教

⁷⁹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pp. 48-49. 案：此鈔本有甲乙兩本，甲本缺鈔畢日期，Serruys 從乙本補。

⁸⁰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p. 136; *Folklore Ordos*, p. 195.

界戒律的廢弛，創立後來稱為黃（帽）教的格魯（dge lugs）派，其意為「善規」，重視戒律的約束。而且重修其精寺，舉辦法會，又發起拉薩大祈法會，並修建甘丹寺，聲勢及影響力大增。當永樂帝特使抵達時，宗喀巴正忙於籌備拉薩傳召大法會，無法分身，因此婉言謝絕。到永樂十一年（1413），皇帝又遣派侯顯到拉薩迎請，宗喀巴時以格魯派正處於創建初期，不便離開，但又考慮需要明朝的支持，擴大本教派的影響，於是覆函永樂帝，表示當親率僧眾，即在本本地「以至誠之念，為陛下祈禱，願陛下聖壽綿長皇圖永固」，請皇帝對未能應召來朝諒解。接著，派遣其大弟子釋迦也失（1354-1435）作代表前往南京朝覲。宗喀巴事跡在《明實錄》及《明史》俱未有記載，主要見藏文本《察哈爾喇嘛全書》中之《宗喀巴傳》，一九三五年北平藏學者于道泉，曾將該傳所收之〈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明成祖書〉二則記載作漢文譯注，為研究永樂帝與宗喀巴交往之主要史料。⁸¹

釋迦也失，《明史》以「大慈法王」之名立傳，〈本傳〉云：「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思藏僧稱為尙師也。」釋迦也失清修的《衛藏通志》書作甲木慶曲結，為藏名 byams chen chos rje 的漢譯，〈元太子〉故事文獻本作 Jamjñin chorji sakiy-a yeshi，司律思神甫注釋謂又稱 byams-ch'an ch'os-rje çakya ye-shes 者就是其人。釋迦也失從宗喀巴學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得其要義，對修辭、音韻、曆算、醫學亦有研究，深得其師器重。據《太宗實錄》記載，釋迦也失於永樂十一年底率眾從西藏山南出發，取道成都，於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415.02.02）抵達南京，受到朝廷盛大熱烈歡迎，三日後朝覲永樂帝，命在南京營建寺廟，剃度眾生，舉辦佛事活動。永樂十三年四月初三日（1415.05.11），永樂帝封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誥命，並賜贈金邊黑色僧帽一頂，可見對釋迦也失的優禮。同年七月，釋迦也失奉命前往蒙古、五臺山等地弘揚佛法，翌年（1416）五月辭歸，明廷又厚賜金

⁸¹ 見于道泉，〈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頁939-966。摘要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第1冊，頁113-115。關於宗喀巴的佛教哲學，見王堯、褚俊傑，〈作為哲學家的宗喀巴和宗喀巴的中觀哲學〉，收入陳慶英主編，《藏族歷史宗教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頁143-161。有關歷史背景，見顧祖成，《明清治藏史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頁53-55；伊偉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125-129。

銀、綢緞、佛像、佛經、法器大量財物。內中還有永樂版藏文《甘珠爾》經一百零八函，每函皆有御撰的〈藏經贊〉及〈後序〉，這套首次以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經》今日珍藏於色拉寺。釋迦也失回歸後將明朝賞賜一部分奉獻於宗喀巴，用于甘丹寺擴建佛殿，另一部分用以修建色拉寺，大大增強格魯派的勢力。⁸²〈元太子〉故事說永樂帝「對他非常尊敬，把他作為供奉的對象。這位國師向民眾展示駭人的神蹟，同時以最高超的教義開導皇帝及皇后，然後敷及無量大眾，使其超度塵世入於最高境界」云云，雖然誇大其詞，但亦反映若干歷史事實。文獻本加插這一段枝節，描述永樂皇帝邀請烏思藏佛教大師來朝為其祝福作為故事的終結，明顯地流露西藏佛教對蒙古的宗教信仰及歷史文化觀的影響，口述本則略去這一大結局。

釋迦也失又於宣德四年（1429），應宣宗詔再次到北京覲見，隨在京師講論佛法外，並到蒙古、四川、青海、甘肅、陝西等地建寺傳教。九年六月十五日（1434.07.20），宣宗特封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榮銜，隆重無比。⁸³ 明年，釋迦也失于返藏途中圓寂，終結其為格魯派與明朝兩代皇帝在宗教與政治溝通上的貢獻。

〈元太子〉故事以「永樂皇帝的子孫一一嗣位，成為十三世代統治人民和保衛國家的偉大皇帝」為終篇有重大意義。從故事的結構來說，這是回應開卷敘述「元太子」為元順帝妥懽帖睦爾的遺腹子，到他登基成為明朝的永樂皇帝，其子孫一一嗣位，成為十三世代的統治者，便達致完滿的結局。內文沒有列出十三世代繼嗣皇帝的名號；根據前面兩種《黃金史》及《蒙古源流》的記載，這十三世代是從洪熙（Qunshi）算起，包括英宗兩朝（正統及天順）而止於天啓（Tinchī），自洪武皇帝至天啓皇帝一共二百五十七年。⁸⁴ 在內涵來說，作為蒙古

⁸² 釋迦也失的事跡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五九，頁1811；卷一六三，頁1843；卷一七六，頁1924；卷一八五，頁1981。《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頁8577。松筠，《衛藏通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卷六，〈寺廟志〉，頁277。參見于道泉，〈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頁939, 951, 963；顧祖成，《明清治藏史要》，頁53-55。

⁸³ 見楊士奇等監修，《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卷一一一，頁2491；《明史》卷三三一，頁8577。參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1冊，頁115-116。

⁸⁴ 按《蒙古黃金史綱》頁49列出自洪熙至天啟共十三帝；《蒙古黃金史譯註》，頁189-190（《蒙古黃金史》，頁309）列出自洪熙至天啟共十一帝，闕去天順和萬曆兩帝；《蒙古

史籍的後繼者，這個故事傳達一個很炫耀的、民族本位的政治訊息，就是說，儘管蒙元政權被漢人推翻，由於第二代的明朝皇帝有著元順帝的血統，而他的子孫一一嗣位，蒙古人可以說是與漢人共同統治二百多年。雖然史實並非如此，但未嘗不帶來一些自嘲式心靈上的慰藉。

從篇末書「鈔畢於今朝（指光緒皇朝）第三十三年（陰曆）四月十九日」來看，這個故事的文獻本顯然是根據舊鈔本傳錄，原來年代自然比較早。不過由於資料匱乏，無法核實其編寫時間，只能從元明歷史文獻考察故事的來龍去脈。

三、餘論

簡言之，這件題名〈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元太子、真太子〉的蒙文鈔本，是講述蒙古自十七世紀以來流傳，關於元朝末帝妥懽貼睦爾合汗，在被明朝朱洪武的大軍攻破大都城逃回漠北而終，其已懷孕的小皇妃下嫁明太祖後誕生其子，命名「元太子」，又為明朝皇帝再生一個兒子，命名「真太子」，兩位太子不斷鬥爭而產生驚天動地事端的歷史傳奇故事。這一歷史與傳說交匯錯綜複雜的故事，以蒙古流行永樂帝為妥懽貼睦爾合汗遺腹子的傳說，糅合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其姪建文帝朱允炆於南京宮中自焚，隨即登基為永樂皇帝的歷史為架構，從中敷演有關的蒙古傳聞異說，又穿插類似的漢人野史稗聞，透過說書或撰作者的想像，編織為一件內容豐富、觸目的草原傳統歷史文藝作品。按照蒙古傳統文藝創作的軌跡，故事的作者大概以《蒙古黃金史》及《蒙古源流》為根據，汲取講故事者的描繪，漢人的閭閻燕談或文籍記載，然後以通俗的文字敘述，輾轉鈔錄而流傳於長城內外各地。這個發展途徑的可能性，從故事之有口述本和文獻本同時流傳，而兩者有吻合及互補之處得到證明。

這個傳奇駭俗的蒙古故事，在汲取漢人的傳統之後，又如何通過口頭講述傳播，對漢人相關的民俗傳說有所衝擊，或是對蒙古本族產生特殊意義？這些問題值得深入討論，下面僅舉數例說明。

第一，關於元順帝妥懽貼睦爾末年，任用喇嘛管治漢民，殘虐迫害無辜，既蹂躪男童又欺辱女孩，對處女出嫁者，常藉口為施行成人禮式加以侵犯，奪去其

源流》，頁465-466（《蒙古源流箋注》漢譯本卷八，頁18b-19b）列出自宣德至崇禎共十二帝，闕去洪熙和弘治兩帝。

初夜權，因此激起漢人的仇恨，聚眾在閏八月十五中秋節夜起義，殺害蒙古人，推翻元朝統治的傳說故事。這一事件並無史料可作旁證，但其內容與遺民徐大焯《燼餘錄》的記載相似，反映江南漢人無法忍受蒙古統治的殘暴壓迫，釀起反抗的集體回憶。至於舉事的日子，從漢俗慶祝端午的陰曆五月初五日密議，推遲至慶祝中秋的閏八月十五日執行，無疑因為後者是更大的節日，但又很可能是受到清代以來，漢人在祕密宗教組織的宣傳下，接受閏八月十五日為「三元劫運」的讖言，不少在該日起事反抗滿清政權的先例影響。漢人有更豐富的類似記載，在清末出現的元末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傳說故事，內容與蒙古傳說相若，差異的是加插了自明末以來，被神化為大預言家的明太祖帷幄名臣劉伯溫授計的故事。據說劉伯溫決定在中秋夕起事後，獻議把號召殺害蒙古人的字條藏在祭祀用的月餅餡內，因此民眾一掰開月餅便知道訊息，立刻起來殺戮身邊的蒙古人。兩個傳說故事大概單獨發展，蒙古版本的内容比較簡單，將重點放在喇嘛殘虐迫害漢人為民眾造反的源泉，未交代領導者如何策劃在中秋夕起事殺韃子，看來比較粗糙和早出，但到後來，蒙古傳說似乎為漢人的傳說推波助瀾。須要注意的，漢人版本的「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的出現，與清末祕密會社、革命黨人策動的「反清復明」、推翻滿清的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因為劉伯溫已經被神化為預卜清朝覆亡的大預言家，宣傳他策劃民眾在中秋夕起義推翻蒙古政權，回歸漢人統治，對革命運動無疑有很大的意義，因此這個漢人版本的抗蒙傳說，就憑著劉伯溫本身家喻戶曉的傳說推動，在近現代中國及海外流行不衰。⁸⁵

第二，關於妥懽貼睦爾合汗在大都城淪陷前出走，遺下已懷孕數月的小皇妃，被明朝朱洪武皇帝看上，不知她已有身孕，於是娶她為妻，成為明朝的皇妃，而這個蒙古皇妃在懷孕十二月後誕下一子，命名「元太子」，後來又為皇帝

⁸⁵ 漢人版本的「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有幾種不同時代和類型的記載，見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頁445-446；婁子匡，《歲時漫談》（臺北：文星書店，1967），頁161-162；王世禎，《中國節令習俗》（臺北：星光出版社，1981），頁206-207；黃泊滄，《節日的傳說》（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51；羅啟榮、歐仁煊，《中國年節》（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3），頁103-104；吳孟前、楊秉正選編，《劉伯溫的傳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頁61-63；張紫辰，《中國古代傳說》（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238-239；及雪梨主編，《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節日歲時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頁150等。詳細研究見前注19揭 Chan, "The Demise of Yuan Rule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Legends"。

再生一子，命名「真太子」的故事。這個爲〈元太子〉故事骨幹的異聞，如前所述，是從十七世紀後期出現的《蒙古黃金史》，特別是後繼的《蒙古源流》，宣稱明朝永樂皇帝爲元順帝妥懽貼睦爾的遺腹子脫胎而來。這些以蒙古民族本位的史書，摻雜不少異說傳聞，不能與據實直書的漢人史學傳統相比。在描述這件事時，佚名編撰者已將蒙古皇妃生的兒子鎖定爲未來的永樂皇帝，而後來洪武皇帝的漢人皇后所生的兒子就變成未來的建文皇帝。近人考證已指出永樂帝爲元朝末帝遺子說的荒誕虛誑，是附會漢人流傳永樂的生母本是洪武皇帝的蒙古碩妃（系出弘吉剌部的皇妃），不過這個謠傳迎合蒙古人在漢人統治下需求補償的心理，所以在長城內外都成爲談助的焦點。因此，〈元太子〉故事加以宣揚，把蒙古皇妃說成一共生元太子和真太子兩個兒子，二者爲兄弟，附會於朱棣與朱允炆，與史實上的朱棣與朱允炆爲叔姪的關係調亂，在蒙古傳統上說並不是創新。說書者的創新除鎖定蒙古皇妃共生二子，並將二者的關係，與歷史上燕王的「靖難」之變配套，進一步發展「元太子」建造北京城以至登位爲永樂皇帝的故事。這些情節，看來似乎對漢人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爲這故事並沒有漢語翻譯，不過，永樂帝爲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卻因爲《蒙古源流》在清乾隆後期已有滿、漢文兩種翻譯，流通廣遠。所以，〈元太子〉故事亦沾受其利，不但在草原地區流行，在漢人地區亦成爲家喻戶曉的蒙古傳說，間接推動漢人一直流傳，永樂帝生母爲元朝末帝弘吉剌皇妃的傳說。

第三，關於明朝洪武皇帝爲解決兩個兒子的爭鬥，便派元太子出戍北邊，把真太子留在身邊爲繼承人，而元太子聽從蒙古生母臨終時留下的指示，請求父皇派遣謀臣劉伯溫隨行，一行到了南口岔，遇到黑臉異人授計規劃建造北京城的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元太子〉故事描述北京建城，糅合蒙古以「箭程劃地界」興建寺院的傳統、草原民族對黑帝真武的崇祀與神化，以及明清流傳關於劉伯溫預測國運的讖言，不但創造一個奇情的歷史故事，而且催生了馳名的「劉伯溫製造哪吒城」傳說。民國以來，北京人都流傳北京城是由永樂帝的謀臣劉伯溫與姚廣孝競賽，依照哪吒神童子的模樣繪圖建造的，這個稱爲「八臂哪吒城」的民間故事膾炙人口，家喻戶曉，風靡一時。但劉伯溫是洪武時人，姚廣孝並無參與建城，哪吒是明清小說中唐朝名將「托塔天王」李靖（571-649）的第三太子，如何與北京城發生關係？筆者年前曾撰作專書，考出故事始源於元世祖忽必烈合汗（1260-1294在位），命謀臣釋子聰（劉秉忠，1216-1274）在幽州規劃建造大都城，據稱他設置十一座城門，象徵那吒（明清作「哪吒」）的「三頭、六臂、兩

足」的傳說。這因為大都貴為帝王都城，需要守護神鎮懾，那吒是佛教密宗毗沙門天王的第三子，勇猛剛健，法力無比，不但護佑國王，維持國疆，殄滅邪魔，又具備「心明」，降伏天龍，禱雨消旱，而燕地常遭天旱之苦，大都缺乏水源，那吒能伏龍禱雨，正符合民眾對守護神的禱求。經過元明兩代，時移世易，這個傳說演變成「劉伯溫製造哪吒城」的傳說。⁸⁶ 在演變的過程裏，哪吒城傳說形成的客觀因素——都城需要守護神和幽燕地區缺乏水源——依然存在，改變的是北京代替大都，劉伯溫取代劉秉忠，並且加插姚廣孝競賽畫城圖的情節。不過，劉伯溫雖然是近代中國民間傳說家喻戶曉的神奇風角人物，《英烈傳》說他是劉秉忠的孫兒，但他不是永樂時人，又未曾與北京發生過任何關係，編造故事者如何把他與哪吒城傳說拴在一起？今本蒙古故事說元太子獲得劉伯溫隨行出戍南口岔，遇到黑臉異人授計建造都城，是唯一講及劉伯溫在北京建城的民間故事，漢人亦有輾轉傳述，因此無疑是發展「劉伯溫製造哪吒城」傳說的重要靈感和資源！由此可見〈元太子〉故事對北京城傳說演變的影響，和對發展蒙漢兩族民俗交流的貢獻。⁸⁷

第四，關於永樂皇帝在登位後想起生母的遺言，著他在榮顯時打開另一封留下的信件，透露他原是妥懽貼睦爾合汗的骨肉，囑他優待蒙古人，而永樂後來邀請烏思藏格魯派宗喀巴大師來訪，大師推薦其高足釋迦也失來朝，弘揚佛法，普度眾生，為明朝統治奠定基礎，十三世代相繼嗣位的故事。這些情節表述兩個互有關聯，但各有特別意義事件的總結。首先是永樂帝打開其生母的第二個密封信件，跟著執行其指示，顯示蒙古皇妃的遺願全部兌現；其次是借永樂帝邀請烏思藏宗喀巴大師的高足來朝，弘揚佛法，反映蒙古與西藏政教的交流作為永樂一朝的成就。這裏編撰者分別汲取了漢藏兩族的有關記載和口述傳統。例如，故事說

⁸⁶ 詳見陳學霖，〈元大都建城傳說探源〉（1987），收入《史林漫識》，第四章；又見《劉伯溫與哪吒城》，第三、四章。

⁸⁷ 民國初年，北京流傳一則關於劉伯溫在燕王出戍南口時，交給他一個密封的「小包裏」，著他在有危難之時拆開，跟著指示行事的故事。當燕王到達目的地，為建城的事傷腦筋，便把小包裏拆開，看見頁首寫著：「當抵達北平府後，你需要建造一座城郭，稱它為『哪吒城』，工程可能很費錢，你應通傳召令各處富戶捐輸築造。頁背後是城市的藍圖，你必須謹慎地依照圖則行事。」這個顯然係從蒙古流入北京關於建城的故事，其來源昭然若揭，不過筆者寓目的是英文譯本，見 E. T. C. Wer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London: George G. Harrap, 1924), pp. 227-230；漢語節譯見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頁92-93。

永樂帝在知悉自己的身分後，開始善待蒙古族人，禁止漢人斬下他們的頭顱、割掉心和肝臟，用作在八月十五日中秋夕祭月的習慣，改以西瓜和月餅取代。事實上，漢人歷來用西瓜和月餅為祭品，如他們所傳的「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就有把號召殺害蒙古人的字條，藏在月餅餡內作為傳訊起義的說法，因此，這裏故事是汲取漢人的傳說加以改造。至於下面說永樂帝遣使到烏思藏邀請宗喀巴大師的高足釋迦也失來訪，待以國師之禮，而釋迦也失向民眾展示駭人的神蹟，並以最高教義開導帝后，敷及無量大眾，使其超度塵世云云則是來自西藏的傳統。史稱永樂帝封釋迦也失為「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而宣宗更賜以「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的榮銜，今傳故事正反映釋迦也失的隆重地位和格魯派佛教在中國的發揚，以及對蒙古政教的影響。⁸⁸ 最後以「永樂皇帝的子孫一一嗣位，成為十三世代統治的偉大皇帝」為結語，更為整個蒙古故事的意圖畫龍點睛。這就暗示：永樂帝既然是妥懽貼睦爾合汗的骨肉，繼承他的十幾世代明朝皇帝就都有蒙古的血統，所以蒙古族還是繼續統治中國！

綜合所述，這件講述近世蒙古統治中國一個最傳奇的歷史故事的蒙文鈔本，為蒙古族保留一份內容豐贍，充滿歷史意義和流露民族意識的珍貴文獻。透過技巧的史料剪裁和傳說故事的糅合，佚名的作者（或是集其大成的編撰者）為蒙古族人塑造了雖敗猶榮的歷史假象，令人相信妥懽貼睦爾合汗雖然喪命漠北，但是他的遺腹子「元太子」卻成為明朝的永樂皇帝，而其後裔相繼嗣立，所以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國政權在中國並沒有完全消失。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廂情願的、民族本位的歷史觀，對漢人而言，是荒誕不經的胡說，但無論如何，它在中國各民族間的鬥爭及和平相處的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同時，不論是口頭傳述或是文字描繪，這個故事表現蒙漢歷史和民俗文化長期的相互交流；蒙古作者固然吸納了大量漢人的記載和傳說以充實內容，漢人同樣亦透過汲取蒙古的口述傳統發展本族的傳說。因此，這件蒙古文獻無疑是一件探討蒙漢兩族共享的珍貴文化遺產，值得歷史和民族及民俗學家的重視。

（本文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⁸⁸ 參見前注85揭有關元末漢人「八月十五殺韃子」傳說故事的論著。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收入《正統道藏》，上海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藏明刊本，1924-1926，第608冊。
- 《過去現在因果經》，《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第189號。
- 《增一阿含經》，《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第125號。
- 大嶽山人，《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內文作《建文遺蹟》，嘉靖辛卯〔1532〕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舊鈔本，1969。
-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萬曆十八年（1590）刊本，1965。
- 王泌，《東朝記》，收入孫幼安纂，《稗乘》，《百部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四川李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
-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 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 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 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色道爾吉譯，《蒙古黃金史》，呼和浩特：蒙古學出版社，1993。
- 何喬遠，《名山藏》，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崇禎十三年（1640）刻本，1971。
- 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李清，《三垣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沈曾植箋注，張爾田校補，《蒙古源流箋注》，沈氏《海日樓遺書》第一種，姚家埭沈氏藏板，1932。
- 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 （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第2036號。
- 明太祖御撰，《皇明祖訓》，收入吳相湘主編，《明朝開國文獻》第3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5。

- 明太祖御撰，《皇明祖訓錄》，收入吳相湘主編，《明朝開國文獻》第3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5。
- 松筠，《衛藏通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姜清，《姜氏祕史》，收入胡思敬編輯，《豫章叢書》，南昌編刻局印行，1915。
- 姚廣孝等監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
- 皇甫錄，《皇明紀錄》，收入李枏編輯，《歷代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影涵芬樓覆萬曆刊本，1940。
- 范欽（？），《隨言》，嘉靖十一年（1532），收入姬佛陀輯，《廣倉學窘叢書》，上海：倉聖明智大學，1916。
- 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中華書局，1959。
- 徐大焯，《燼餘錄》乙編，收入謝家福輯，《望炊樓叢書》，蘇州文學山房據光緒中原刊本彙印，1924。
- 徐渭（？）著，趙景深、杜浩銘校訂，《英烈傳》，上海：四聯書店，1955。
- 珠榮嘎校訂，《阿勒坦汗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 祝允明，《野記》，收入李枏編輯，《歷代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影涵芬樓覆萬曆刊本，1940。
- 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55。
- 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岱，《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張輔等監修，《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
- 張穆著，何秋濤校，《蒙古游牧記》，收入浦口編輯，《皇朝藩屬輿地叢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刊本。
- 梁億，《傳信錄》，收入佚名編輯，《九朝談纂》上冊，《清代禁燬書叢刊》第一輯，臺北：偉文圖書公司影清抄本，1977。
- （釋）祥邁，《至元辯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第2116號。
- 許有壬，《圭塘小稿》，《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陳槐，《聞見漫錄》，收入張壽鏞編輯，《四明叢書》第四集，民國四明張氏約園刊本，1936。
- 陸粲，《庚巳編》，收入沈節甫編輯，《紀錄彙編》，長沙：商務印書館影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本，1938。
- 彭大雅著，徐霆疏，王國維箋注，《黑鞬事略箋注》，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

- 焦竑纂輯，《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1965。
- 黃佐，《革除遺事》，收入袁褰編輯，《金聲玉振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嘉靖鈔本影印，1996，史部第47冊。
- 楊士奇等監修，《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
- 解縉，《天潢玉牒》，收入（1）沈節甫編輯，《紀錄彙編》，長沙：商務印書館影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本，1938；（2）吳彌光編，《勝朝遺事彙編》，光緒九年（1883）刊本；（3）袁褰編輯，《金聲玉振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嘉靖鈔本影印，1996，史部第19冊；（4）鄧士龍編，《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據萬曆鈔本排印，1993。
- 劉（？）佶，《北巡私記》，收入羅振玉輯，《雲窗叢刻》，1914。
- 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潘裡章，《國史考異》，《叢書集成》本，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 談遷，《棗林雜俎》，收入張鈞衡編輯，《張氏適園叢書初集》，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
- 談遷，《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蘇天爵，《國朝〔元〕文類》，《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權衡，《庚申外史》，見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 道潤梯步，《〔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 朝鮮《定宗實錄》，東京：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影刊本，1953。

二、近人論著

于倬雲

1982 《紫禁城宮殿》，香港：商務印書館。

于道泉

1935 〈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939-966。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

1994 《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第1冊。

王世禎

1981 《中國節令習俗》，臺北：星光出版社。

王崇武

1948 《明靖難史事考證稿》，四川李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堯、褚俊傑

1996 〈作為哲學家的宗喀巴和宗喀巴的中觀哲學〉，收入陳慶英主編，《藏族歷史宗教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143-161。

伊克昭盟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伊克昭盟志》，北京：現代出版社。

伊偉先

2000 《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朱希祖

1933 〈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2.1：1-13。

1936 〈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碩妃說〉，《東方雜誌》33.12：5-19。

吳孟前、楊秉正選編

1984 《劉伯溫的傳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吳晗

1935 〈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北平）10.3：631-646。

1965 《朱元璋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晉華

1936a 〈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45-53。

1936b 〈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55-77。

沙·比拉（蒙古）著，陳弘法譯

1988 《蒙古史學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邱樹森

1991 《妥懽貼睦爾傳》，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周清澍

1987 〈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3：1-18。

孟森

1961 〈建文遜國事考〉，收入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世界書局，頁1-12。

陳學霖

尙秉和

1938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姜舜源

1991 〈五行、四象、三垣、二極——紫禁城〉，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史探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251-260。

郝兆矩、劉文峰

1994 《劉伯溫全傳》，大連：大連出版社。

倫明

1932 〈建文遜國考疑〉，《輔仁學誌》3.2：1-62。

孫文良、李治亭

1983 《清太宗全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徐作生

2000 《泛槎考迷錄》，北京：學苑出版社。

烏蘭

2000 《〈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莊吉發

1995 〈閏八月——民間祕密宗教的末劫預言〉，《歷史月刊》92：61-65。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

1988 《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

陳學霖

1996 《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7 《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a 《史林漫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01b 《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馬西沙

1989 《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商傳

1984 〈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3：119-130。

1991 〈論解縉〉，《明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141-158。

婁子匡

1967 《歲時漫談》，臺北：文星書店。

張存武等著

1983 《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張惠衣

1937 《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 張紫辰
1986 《中國古代傳說》，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張德信、譚天星
1993 《崇禎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雪犁主編
1994 《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節日歲時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 黃兆漢
1988 《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黃泊滄
1982 《節日的傳說》，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傅斯年
1931 〈明成祖生母記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406-414。
1936 〈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79-86。
- 喻松青
1987 《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葉新民
1998 《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 楊訥
1965 〈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4：117-134。
- 楊毅
1985 〈射箭畫寺界、跑馬關山門——元大都聖壽萬安寺規模瑣談〉，《燕都》1985.1：24-25。
- 趙景深
1983 《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
- 鄭志明
1995 〈末劫預言與卯劫觀音〉，《歷史月刊》92：65-69。
- 劉德隅
1976 《明劉伯溫生平事跡拾遺》，臺北：自印本。
- 羅啓榮、歐仁煊
1983 《中國年節》，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
- 顧祖成
1999 《明清治藏史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陳學霖

山本守

- 1944 〈永樂帝と建文帝——永樂帝と蒙古伝記〉，收入《遼東の珠》，盛京：滿洲時代社，頁107-117。

田中萃一郎

- 1900-1902 《東邦近世史》，東京：東邦協會。

石田幹之助

- 1941 〈元代工艺家ネベルの王族阿尼哥について〉，《蒙古學報》2：244-260。

和田清

- 1959 《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

岩井大慧

- 1922 〈元代の佛僧と成女式と〉，原文撰於1922年，收入同作者，《日支佛教史論攷》，東京：東洋文庫，1957，頁357-544。

牧田蹄亮

- 1959 〈道淵傳小稿〉，《東洋史研究》18.2：57-79。

細谷清

- 1936 《滿蒙民俗傳説》，東京：東龍閣。

磯野富士子

- 1966 《オルドス口碑集：モンゴルの民間伝承》，東京：平凡社。

Aubin, Françoise

- 1984-1985 “In memoriam Le R. P. Henry Serruys (Ssu Lü-ssu 司律思), CICM (10 juillet 1911--16 août 1983),” *Monumenta Serica* 35: 555-624.

- 1990-1991 “In memoriam Le R. P. Joseph van Hecken (Ho Ko-nam 賀歌南), CICM (18 Sept. 1905--31 août 1988): mongolisant, sinologue, missionlogue,” *Monumenta Serica* 39: 325-350.

Chan, David B.

- 1975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1398-1402*.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Chan, Hok-lam (陳學霖)

- 1976a “Hsieh Chin,” in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 554-558.

- 1976b “Liu Chi,” in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 932-938.

- 1976c "Yüan Kung," in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I: 1638-1641.
- 1999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variorum).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 Ltd.
- de Rachewiltz, Igor (羅依果)
- 1962 "Yeh-lu Ch'u-ts'ai (1189-1243): Buddhist Idealist and Confucian Statesman,"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9-216, 359-367.
- 1982 "More about the Story of Činggis-qan and the Peace-Loving Rhinoceros," in A. R. Davis and A. D. Stefanowska (eds.), *Austria: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n Oriental Society, pp. 13-26.
- Feifel, Eugene
- 1976 "Yao Kuang-hsiao," in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I: 1561-1565.
- Friese, Heinz
- 1960 "Der Mönch Yao Kuang-hsiao," *Oriens Extremus* 7: 158-184.
- Goodrich, L. C. and Chaoying Fang (eds.)
- 1976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issig, Walter
- 1985 "Ein Quellenbezug der Altan Khan Biographie," 《蒙古史研究》 1: 185-192.
- Lattimore, Owen
- 1979 "A Mongol Legend of the Founding of Peking,"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III: 237-239.
- Mostaert, Antoine (田清波)
- 1937 *Textes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1.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 1945 "Antonio Mostaert, de studiis in linguam mongolicam per annos quadraginta optime merito," *Monumenta Serica* 10: 1-4.

- 1947 *Folklore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 1999 *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 C.I.C.M. Missionary and Scholar*, Vol. 1: Papers; Vol. 2: Reprints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IV, V), K. U. Leuven: F. Verbiest Foundation, China-Europe Institute.
- Mostaert, Antoine (ed. and annot.)
- 1969 *Manual of Mongol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 Scripta Mongolica 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rruys, Henry (司律思)
- 1960 "Ta-tu, Tai-tu, Dayidu,"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 Taipei) 2.4: 73-96.
- 1968 "Ho-po, ho-pao 'pouch': Turkic gap, xap," *Oriens Extremus* 15: 135-148.
- 1972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 Hangin and U. 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8. Bloomington, Indiana: Mongol Society, pp. 19-61.
- 1975 "A Catalogue of Mongol Manuscripts from Ord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2: 191-208.
- Serruys, Paul L-M (司律義)
- 1977-1978 "A List of Publications of Paul L-M Serruys up to 1977," *Monumenta Serica* 33: II-V.
- Shaw, J. S. (邵循正)
- 1937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 492-498.
- van Hecken, Joseph (賀歌南)
- 1969-1972 "Documents Mongols (Ordos), provenant des Archives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de Boro Balyasu, Mongolie Intérieure,"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II(1969): 209-224; IV(1970): 327-342; V(1971): 105-119; VI(1972): 401-423.
- 1971 "Pater Lodewijk Jozef Maria Schram (1883-1971): Een Brugs missionaries en etnoloog," *Haec Olim* 21: 16-24.

- 1972a "Antoine Mostaert, cism (1881-1971), apôtre des mongols et doyen des études mongoles,"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naire* (Immensee, Suisse)28, 1: 30-43; 2: 81-94; 3: 185-199.
- 1972b "Bibliographie Antoine Mostaert,"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Bonn), V: 13-16.
- Werner, E. T. C.
1924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London: George G. Harrap.

Apropos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Mongol Story “How Emperor Yongle of the Great Ming Built the City of Peking”

Hok-lam Chan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v. Antoine Mostaert, CICM, the renowned Belgian missionary and Mongolist, acquired a rare Mongol manuscript from the Ordos in Inner Mongolia titled “Book of the Story of How Emperor Yongle of the Great Ming built the City of Peking. The Yuan Prince, The True Prince.” There were two handwritten copies, both were transcribed in 1907 but no date nor identity of authorship was given. The Reverend also recorded from storytellers an oral version of the same story short-titled “The Yuan Prince, The True Prince.” In this fiction-laden story the Yuan Prince refers to the posthumous son of the last Mongol-Yuan ruler Toghon Temür *gaghan* by his Mongol *qatun*, who later became an adopted son of the Ming emperor Zhu Hongwu; and the True Prince, his younger brother born later to the same mother. The True Prince inherited the Chinese throne after the Ming emperor’s death, and the Yuan Prince subsequently replaced his brother as Emperor Yongle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former committed suicide. In actual history, however, the Yuan Prince referred to Zhu Di, the Prince of Yan, Ming Taizu’s fourth son by a Mongol consort from the Qonggird tribe; and the True Prince, to Zhu Yunwen, the grandson of Ming Taizu, who inherited the throne as the Jianwen emperor after his grandfather’s death. The Prince of Yan succeeded by usurping the throne from the Jianwen emperor after a two-and-half years of civil war; their relationship was uncle to nephew, not as elder to younger brother as the story asserted.

In 1972 the Reverend Henry Serruys, CICM, Mostaert’s protégé, introduced this valuable manuscript by publishing a study which includes a Latin transcription and a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al notes under the title: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Bloomington, Indiana: The Mongol Society). In an admixture of legend and history, the story presents several highlights of facts and fiction in a Sino-Mongolian setting. They begin with the anti-Mongol

Chinese uprisings on the eve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n the 1360s; the Ming emperor Zhu Hongwu's capture of Dadu and Toghon Temür's hurried departure; the pregnant Mongol *qatun*'s marriage to the Ming emperor without revealing her conception; her birth of the posthumous son the Yuan Prince, and another son fathered by the Ming emperor named the True Prince. Following this, concerned about the enmity of his two sons, the Ming emperor dispatched the Prince of Yuan to the land of future Peking to establish a fief; before this, in her sick bed the Mongol *qatun* gave the Prince two letters in separate sealed envelopes, with the instruction that he opened one in time of suffering, and another one in time of success; now in great distress, the Prince unsealed the first letter, and,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 pleaded with the emperor for the service of adviser Liu Bowen and his request was granted. After arriving at the designated locality, the Prince of Yuan ran into a burly swarthy-faced rider who took away his bow and arrows, then shot one arrow at each of the four directions, admonishing the Prince to appoint Liu Bowen in charge of building the capital in the area where the arrows had fallen and where caches of gold, silver, and jewels will be found. With the great city thereafter known as Peking being built, the Prince set up his own fief in the region, but soon learned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in Nanjing and hurried there with a company of soldiers to pay homage. At this time the "True Prince" had already ascended the throne, but upon learning the arrival of his elder brother and remembering the earlier enmity, the Prince was frightened and hanged himself. The story ends with the Prince of Yuan returning to Peking where he enthroned in succession to his late father to become Emperor Yongle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and inaugurated a lineage of thirteen generations of successive rulers. In a nutshell, by propagating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ongle emperor, the story imaginatively provided the wistful consolation to the Mongol community that even though the Yuan dynasty had fallen, the rulers of China remained in the hands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ongol *gaghan* through the lineage of the "Yuan Prince."

Despite his pivotal effort, however, Serruys has not closely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sources and the Mongol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presented in the story. Besides providing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Mongol story,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not only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various episodes, but also examine the Mongol views of

history and the intermingling of Mongol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manuscript's contribution to Sino-Mongolian historical studies.

Keywords: Yuan Shundi, Toghon Temür *gaghan*, The Yongle Emperor, Ming Peking, Liu Bowen (Liu Ji)